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3 年 9 月 30 日第 23 期（增刊）

本期目录

〔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史林一叶

张一哲 大饥荒与文革

阅史漫笔

张一哲 这故事我在课堂上讲了二十年

张一哲 从李九莲是造反派头头说起

张一哲 人权缺失：李九莲悲剧的深层原因

〔张一哲造反派研究专辑〕

说明：造反派，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有的历史现象和拥有亿万参与者的复杂群体，是文革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但因文革之后的“揭批查”、“清理三种人”等运动将造反派整体打入另册，以致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许多著述和文艺作品中，造反派被严重脸谱化、妖魔化，原本在文革的不同时期由其他群体所干的坏事统统算到了造反派账上，在许多问题上造反派成为本应承担历史罪责的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替罪羊。为推动对造反派的研究，本刊特选发张一哲先生的这一组文章。

张一哲，原名张小金（右图为近照），1948 年生，江西吉安人。1966 年高中毕业生，文革初期参加过造反派红卫兵。后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已退休）。出版有《经济开放的非经济效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外开放与社会转型》、《资本论与科学研究方法》等学术专著 5 部，与他人合著 13 部，译著 2 部。近年来对造反派问题与江西文革历史作了许多思考，所写这方面文章多发在博客上，但屡遭删帖，因而不断修改重发。本专辑中的几篇均节选自其博客文章自选集《低声说真话》（自印书），本刊发表时略有修订。



【史林一叶】

大饥荒与文革

张一哲

按：本篇节选自《言论自由与大饥荒——电影〈1942〉观后》。

造反派大字报揭露大饥荒

1966年11月，我第一次知道几年前发生的河南大饥荒。

那是文革初期大串连时。1966年11月2日凌晨2点，停驶的火车把本来要去北京的我们抛到郑州站，这个偶然性使我开始与河南结缘。

那次，我们住在一个纺织局的接待站。至6日离开，我们在郑州呆了4天，连看了四天的大字报。

第一次到河南，有两件事情留下深深的印象。一个是满街的豫剧音乐声。无论是街头喇叭还是商店和广播车的喇叭，到处都是激越或柔曼的豫剧唱腔；还有一个，就是在郑州街边看到了揭露大饥荒饿死人的大字报和传单，连标题和用词都是愤怒中透着血腥，比如“千刀万剐吴芝圃”之类，里面的记述惊心动魄，让人哭泣而又有点令我生疑。

我是经历过那几年饥饿的人。记得我刚上初一时，有一天校党委书记召集我们在校搭伙食的学生开会，说国家遭了大旱灾，每个人都要减少粮食定量。可能太年轻了，当场我对此没有什么明显反应。后来，慢慢地感到了饥饿。那两年，我每个月定量是24斤大米，但因为没有任何油水，每天都是饥肠辘辘的。到1962年底，情况慢慢有了好转时，老师告诉我们是苏修趁着我们遭灾来逼债，才使得我们没有肉吃。心中曾经有过的些许怨气也早烟消云散。随后几年情况越来越好，饥饿的感觉早已远去了。但却从来没有想过，在我们一个月吃着24斤大米的时候，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这可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呀！这可是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河南省呀！怎么可能呀？但是多看几份传单而且看到那么多河南人在说这件事情，就不免相信了。当时心里的想法是，“走资派”真坏呀，文化大革命不搞不行呀！具体的信息我记得不多了，但有几个关键词我却记了几十年。

第一个关键词是“信阳事件”。信阳是饿死人最多的那个地方。那些造反大字报，多次说到饿死几十万人（现在的说法是105万）的信阳事件；第二个词是“郑大联委”，就是写大字报发传单的那个大学生造反组织；第三个关键词是饿死人时候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大字报指控他是主要责任人。大字报指控的另外几位河南省长官的名字，此前没有听说，但此后一直没有忘记。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年轻记性好。我这里就不点他们的名字了。

今天回过头看，当时河南两派的语言都免不了时代打上的左的印记。但当年

郑大联委大字报的文革语言，并不影响他们追索真相和正义的锋芒。现在回想，那些造反的河南人能够在郑州一次又一次地集会，一呼百应，是因为在满街的赤旗、大字报墙、震耳欲聋的口号和满天飞的传单背后涌动的，是大饥荒幸存者们的岩浆喷射般的愤怒啊！是因为那刚刚逝去的几十万上百万的冤魂还在河南土地上徘徊啊！可以说，四十几年前这些河南娃娃们这场对大饥荒真相的揭露和追逼，对造成大饥荒的某些罪人或责任人的抗争和大控诉，是河南人和中国人至今没有超越的。

不久之后，在北京我还听闻了其他两个省饿死人的信息。一个是四川，另一个是安徽。新中国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事情毕竟是我当时难以接受的，每次都引起心中的强烈震动。12月份我回到江西之后，在我所在的吉安街头，也看到一张大字报，揭露吉安县敖城公社在困难时期也饿死了十几个人。我那时候的思维比较简单：饿死人是党内走资派的官僚主义和浮夸风等错误造成的。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得了，否则以后还会饿死人。

我之所以当时完全不会想到饿死人与毛的错误有关，除了那时我对毛的崇拜和信仰之外，还有一个具体原因。那就是我在早几年看到毛泽东一封党内通信，内容都是关于讲真话纠正浮夸风的。最早我是在江西东固山垦殖场看到的，像普通布告那么大纸张的黑体印刷品张贴在办公楼墙上。那时候我才10来岁，对于这封信的背景一无所知，但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很少在墙上看到这样的读物，而且它到处张贴着，我也因此看了好几遍。以后文革中，又多次看了这封信。这封信使得我很容易地认为，造成饿死人的浮夸风和说假话是毛所坚决反对的。而且这封信的公开是在河南饿死人之前。我所在的江西省，毛的这封信在农村中是全面公开张贴的，我不知道当时的河南省是否也是这样。如果河南也是这样，怎么还会出现后来所揭露的那样的情况呢？

揭露大饥荒的河南人

4个月后，河南大饥荒的故事再次直接触动我。

那是在1967年3月中旬。一天晚饭后，我去了北京地质学院河南上访人员的住地。那个晚上也有两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一个是见到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的年幼儿子。一个女学生告诉我纪登奎被军区和保守派抓起来了，他儿子和她们一起逃到北京来。另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河南的大学生和我详谈了他们揭露河南大饥荒却被打成“反革命”的故事。

那个男生，感觉比我年龄稍大，所以猜他是大学生。他们睡在水泥地板上，放些稻草，被子凌乱地叠在上面。我们就坐在地铺上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告诉我的内容大致是：早在前一年，1966年夏天，郑州大学就贴出了一份转抄自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大字报详细地描述了“信阳事件”及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大规模饿死人的惨状，而且直接称吴芝圃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从1966年9月份开始，他们的造反是从揭批原河南省委1960年前后大刮“五风”，左倾蛮干（那时候的词汇），造成骇人听闻的“信阳

事件”入手的。连续召开几次万人大会，揭露和控诉大饥荒、大饥饿的事情。他们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紧紧抓住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饿死几十万人的事情。这个大方向，深得人心，从运动初期的少数派（很快）成了多数派。1967年1月份，一方面他们深入信阳等地继续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祸首”，成立了一个“专揪吴芝圃联络站”（当时吴已调中南局任书记）。但是，河南省军区介入文革后，郑大联委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负责人党言川被抓进监狱，材料被抄了，饿死人的那些责任人也被保护起来了。

和我说这些情况的那位小伙子，虽带着很重的河南口音，但他的叙述却非常清晰和详细。我的感觉，他自己可能就是来自农村的有过大饥饿亲历的大学生。他非常坚信自己的正义性：饿死人的责任追究，是天理。

我问他，党言川被抓，给他定的什么罪名？他说，文革初期，工作组搞到党言川1962年写给一同学的信，信中有些错话，给抓住把柄。他为之辩解，说只是因为对饿死人的义愤而说了过头话。以私人信件作为思想罪的证据，从反胡风时就延续下来。而在文革初，以及文革中，这都是常见手法。当时我觉得军方对于镇压和抓人找点理由是很容易的事情，并不以为然。因此也没有具体了解党言川的“错误言论”究竟是什么。几个月后我听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党言川为他1962年在私信中怀疑“三面红旗”的“错误言论”做了检查，然后参加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

河南大饥荒饿死人的故事就是这样再次与我遭遇。其实，前一天下午我刚见了地质学院造反派头头朱成昭。朱后来成为最早反思文革的先驱之一，此时正因为同情彭德怀而被中央文革命令闭门思过。现在回过头想，朱的某种醒悟其实也是间接涉及大跃进后的饿死人问题，而且这种对大饥荒的揭露和反思也不光是朱成昭一个人。当时地质学院的学生造反派，曾把四川的李井泉当作大饥荒饿死人的祸首来揭露和批判。在当年的年轻人看来，饿死人决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也决不是毛泽东的政策。所以他们以极大的牺牲精神投入调查，并且对当时揭露大饥荒真相的很多干部给予保护。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川的“萧、李、廖反党集团”，这些干部就因为向胡耀邦、杨尚昆反映四川大饥荒饿死人的情况，被李井泉打成反党集团。他们当时逃到北京就住在地质学院，受到大学生支持和保护。2004年，我在网上看到出了一本书《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漩涡》，作者是“萧李廖集团”一个幸存者，文革后平反复出当了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廖伯康。书中讲述四川的大饥荒，并且专门写了文革中北京地质学院那些学生怎么帮他。这本书李锐给作序，他对文革中的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学生的行为既感动又意外。他和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样的普遍常态：文革中的造反派都是揭露大饥荒饿死人，而其对立面组织则往往指责造反派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旗，其背后也往往有那些大饥荒责任人的身影。我在网上看到李锐的序言，但原书却一直找不到。（本刊注：此书单行本未能出版。廖伯康此文及原拟用作书序的李锐读后感均载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05年11月第一版）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亲身经历，从此，我对于河南的文革，对于河南的大饥荒，

对于造成大饥荒和揭露大饥荒的河南人，就一直关注着。

上世纪 90 年代，一位最早做口述史的北京社会学家给我看一份揭露大饥荒的回忆录，就是当年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写的。我记得看的是钢笔写的格子稿纸，那些纸张已经发旧。看完那位重病中的老人所写的文字，心头非常沉重。我对这位社会学博士说，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我在文革中已经知道了。有 20 年时间没有听人说这段历史了。

最近一些年，河南人的形象受到某种妖魔化。我想，某些河南人做了坏事，不能让所有河南人来担责。而且，我所接触过的河南人，例如文革中的这两次，都是最有血性的中国人。所以，我从来也不受那些妖魔化舆论的影响。在我的评价中，那些反抗压迫，揭露黑暗，为民请命的河南人，是河南人中也是中国人中的英雄；而那些欺压和镇压人民、草菅人命的河南人，是河南人中也是中国人中的渣滓。

今天再看党言川的“反革命”言论

那么，当年被军区和保守派紧紧抓住小辫子的党言川“反革命”言论究竟是什么呢？当年被毛、周支持的党言川为什么不得不检查“错误思想”才能进入革委会呢？揭露大饥荒的他为何文革之后又被送进大狱呢？

时隔几十年之后，我终于在网上找到了党言川当年那些“反革命”言论。我想，中国今日之左派和自由派，以及一切自认为或者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都值得一起来温习一下令这位当年年轻的大学生付出一辈子惨痛代价的“反动”言论：

“你在第一封信中谈到你的学习心得和你对农村 58—59 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 58—59 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不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就难了。”

这就是一个不到 20 岁的大学生在 1962 年的一封私信中写的话。这就是某些人一再将其投入监狱的“反革命罪证”。

今天看来，党言川的上述言论有错吗？

撇掉那些时代化的语言，这个当年的“反革命”有多不简单啊！他在信中对大跃进的左倾错误的明确尖锐的批评，他反思如此之早和尖锐深刻，令我们在几十年后都感叹不已。

今天我们读到这些话语，即使是党内那些最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或

者文革后的党内杰出的改革派，也不能不感到自惭形秽吧。

我不知他文革中究竟还干了什么违法之事。只是想问：当他在怀疑“三面红旗”、揭露大饥荒、批极左浮夸时，我们在干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干什么？年长于他或与他同龄的自由派精英们在干什么？至少，我所亲身经历的河南造反派揭露大饥荒的行动，他们追求真相和正义的勇气和担当，一点也不逊于今天最勇敢的自由知识分子。

我想问中国时下的毛左，不要拿他与当年整他的那些人比，就拿他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和周恩来比，他有错吗？我想问中国时下的自由派，你们中间有谁在 1962 年时达到过党言川的水平？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包括党内最有名的那些改革派精英，有谁的勇气和担当，有谁对大饥荒的揭露，能够比得上那个坐进大牢的党言川？

几十年后，我知道有许多人在做这件事。但不可忘记，他们都是党言川的后人。无论他们今天是否认同他的文革造反，都应该感谢并公正评价他揭露大饥荒的勇气和贡献。

党内著名的改革派知识分子杨继绳写了一部揭露大饥荒的巨著《墓碑》。我看过杨先生的一些作品，对其品格和见识均表赞同。但在揭露大饥荒这点上，在我看来，杨继绳其实是党言川的遗嘱继承人，尽管杨先生自己未必愿意承认。

今天，我的感觉，那个文弱书生，其实是中原大侠。他如果有什么缺点错误，大都是时代的过错。

80 年代，我一直在尽力跟随官方否定文革的步伐，同时清理和反思文革中人民争取基本人权的某种合理性。一直到 1989 年后，我才终于逐步抛弃官式文革叙事的束缚。现在回首，党言川类的揭露大饥荒的言行是我在否定文革时没有与官媒完全同步的重要因素之一。

历史不是单线条。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知情人：党言川文革初被打成反革命固然是因为他揭露大饥荒，他文革后的命运，与揭露大饥荒有什么关系呢？惩罚他的人与大饥荒又有什么关系？当揭露大饥荒的力量被镇压时，那些造成大饥荒和隐瞒真相的人到哪儿去了？如果，大饥荒责任人都成了受迫害者和英雄，而那些最勇敢的揭露者都进了牢房，那么，河南往后几十年的变化大局面，躲得过与此的关联吗？

有时候感觉河南真是一个诡异的地方。自从 1942 年的大饥荒之后，半个世纪内，又有多次大灾难降临河南。我所知道的，除了 1960 年夺去 200 万河南人生命的大饥荒，还有 1975 年 8 月顷刻间夺去几十万河南人生命的世界最大水库垮坝惨剧。还有 1990 年代让上百万无辜穷人感染艾滋病毒的卖血事件。难道上帝是这么不待见河南人吗？

大饥荒的责任者与揭露者的不同命运

有些年轻的左翼怀疑有大饥荒。他们不相信死了那么多人。我想说，我们不能根据本人非常有限的亲历和常识来推断此事。比如，我所在的江西省死人相对

少一些，因为那时江西粮食的紧张程度远远逊于河南。记得当年周恩来曾经亲自给江西一把手杨尚奎打电话，要求江西调粮食支援外省。但我绝不怀疑河南大规模饿死人。因为我知道饿死人的事情不是来自文革后读文人的文章，而是文革中耳闻目睹亲历者的控诉。

还有些左翼承认有大饥荒饿死人，但他们不承认有那么大的规模，特别是不承认有近 4000 万人饿死。对此，我建议他们去阅读当年的造反派写的大字报，通过有某种思想血缘的沟通，去体认那场曾经的大灾难的真实性。而且，我们可以对具体的死人数据进行更科学的探讨和争论，这不影响我们确认大规模死人的真实性。我关注死亡数字也有至少十年以上，至今也仍然没有一个数字令我确信。但即使按照官方现在承认的说法，难道死亡 1000 万人不已经是天大的事情吗？难道大规模饿死人这样的事情还分不清是非，还没有共识吗？

此外，还有一些争论也许不无意义。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敬毛但信奉宪政民主的教授讨论，他认为毛对大饥荒的信息有及时反应，比如当天批示刘周约谈等等，毛发动文革的动因之一就是饿死人。从河南及许多省的事实来看，揭露和清算大饥荒的责任人未必是毛文革的主要动因，但文革造反派对大饥荒的揭露和清算至少是其直接后果。然而，当时毛对信阳事件的定性，是“阶级敌人报复”，要“补民主革命的课”，我认为是很不准确的。

与此相反，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则认为发动文革是为了掩盖大饥荒饿死人。我觉得这个逻辑链条至少还缺乏对两个问题的合理解释。

第一，文革中遭批的所谓高层走资派或“务实派”在造成大饥荒灾难上并不可脱责。我们看到他们在大跃进中同样的极不务实（无数公开报道和党内正式文件可以作证），看到他们在后来的“纠五风”等方面并不比毛更务实，在反右倾、拔白旗时也一点不比毛务实（无数各派观点的回忆录和党内正式文件可以作证）。尤其是在处理信阳事件以及其它相关事件责任人时也一点都不比毛更“务实”（这里暂且不用其他更准确的词汇，也不引用杨继绳书中所列举的他们表现的部分史实）。党内某些开明人士近年重提党内长期以来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只不过他们认为毛代表错误路线，其他人则代表正确路线。我听了只能一笑置之。至少，就此事而论，可分领导责任和法律责任。如果说领导责任，不仅毛、周有，刘、邓也有。当然，作为一把手的毛，责任更大；如果说法律责任，就目前所见资料，似乎两者都无。没有什么事实证明死人是他们直接的责任，这不仅和吴芝圃、路宪文不同，也和下令开枪杀人是决然不同的。

所以，对毛左，我想说，无论如何，你不能否认毛的领导责任；对党内某些改革派人士，我则想提请他们注意所谓务实派领导人在大跃进中，在反右倾中，在饥荒饿死人事件的处理中他们的领导责任，不要被自造的观念蒙蔽了眼睛。

毛泽东当时认为“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今天看毛的认识，似乎很不到点。但回到 1960 年的思维，则并不奇怪。正因为如此，在这点上，刘少奇等人的认识也

完全一样，认为三分之一天下不在我们手上。以后的“四清”运动，刘少奇就是按着这个思路走，而且一直走到文革初他主持领导运动时。毛、刘在搞阶级斗争方面的区别，仅仅在于，刘的斗争矛头是向下，而毛后来则是矛头向上。

有人说，1960年在信阳事件之后，在信阳地区已经进行过一场针对“党内当权派”的小文革。包括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在内的地、县、公社、大队上万名各级干部被批斗，逮捕4220人，包括地委书记路宪文和7名县委第一书记在内的688人受到刑事处分，3845名各级干部受到纪律处分。我以为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准确。1960年的处理基本上还是共产党一般政治运动的常规。文革的最大特点、最被当权派否定的是群众造反，而1960年的斗争则是保护大当权派整小当权派。

“人相食要上书”这句最有名的话语其实并不表明说话人对大饥荒的正确认识，只是表明他们与毛在应对形势时的不同心态。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一派坚持实质上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一派表现出某种实用主义哲学。后者也许更接近常识，也可以称之为务实。这种务实在夺取政权之前曾经是他们策略的共识，而此时这种务实的主体不是体制的根本变化而只是渡难关的手段，而与此相对的毛则表现了坚定执着或者说一意孤行。

第二、文革的真实历史很有些脱离这个逻辑。文革中大饥荒的直接责任人几乎全部受到冲击，文革后则翻了个个，这些人全部重新上台或平反昭雪，而文革中揭露饥荒的人则多数被打下去。这方面的典型，莫过于河南。

无论是看网上的大量民间资料，还是官网信息，吴芝圃在河南大饥荒中的罪责都是铁板钉钉的。实际上，拿到桌面上来说，争论也不会太大。至于他在一生中的其他功过，不同党派和政见的人可以争论，但是，他在河南60年代饿死200万人的大饥荒中的罪责却是冲破了国人底线的。而且，从现代法理来看，“功”不可抵“罪”。文革前他自己就承认“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中吴芝圃受到河南造反派的批斗，文革后被“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官方公开正式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但却没有讲清楚，文革中揭露和批判他的那些在大饥荒问题上的材料是不是全部都是“诬蔑不实之词”？如果是，那就应该讲清事实真相还吴同志一个公道（可惜我们今天看不到任何只言片语）；如果并非诬蔑不实，那评价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到底抹黑了谁呢？难道那饿死的两百万河南人不是中国人民吗？难道他们活活饿死反而是“解放”吗？站在吴芝圃本人立场来辩解，从最善良最宽容的角度来看他，那样丧心病狂地封锁消息，最起码也是为了保自己官位吧。如果这样的导致数百万生命丧生的私心还算是“无私地贡献一生”，那还有什么词汇比“无私”更无耻呢？就我来说，对吴同志不认识没有任何感性了解，只是根据无数的资料阅读，觉得这样的逻辑太匪夷所思了。盼望真心维护吴同志的人拿出更可信的事实和理由来说服人。如今在国内官网上打出吴芝圃的名字搜索，粗看一下就知道，在成千

上万条结果中，90%以上都是说的他在河南大饥荒中的罪责。历史老人那么容易被推倒吗？如果说，刘少奇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话应验在这里，那么在河南大饥荒饿死两百万人的历史上，吴芝圃的名字是任何人也抹不掉的，恐怕是毫无疑问吧？

就在吴芝圃平反昭雪的同一年，另一位河南名人张钦礼坐进了大牢。

党言川文革后坐牢，我不是太奇怪。因为他是文革造反派头头。文革后造反派代替了国民党人成为新的“政治”贱民，这在全国比较普遍。张钦礼是老革命，又是官方至今承认的典型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他的下场曾经令我颇有些意外。

查阅大量资料，发现了张钦礼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历史，居然又是一个与河南大饥荒事件不可分割的历史人物。根据大量资料记载，当时的兰考县长张钦礼，曾挺身而出批评河南省委（指名道姓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带头搞浮夸，指责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结果受到残酷打击，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关押起来劳动改造。1960年10月，张钦礼冒死写信给周恩来并受到周接见，直接向周反映了河南饿死人的问题。文革中，张钦礼站在揭露大饥荒的群众组织一边，既多次受到打压关押批斗，也多次受到周恩来支持和重用。文革后张钦礼被判刑13年，到死没有平反，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基本人权。

8年前，张钦礼患肺癌去世。对于一个“劳改释放犯”，兰考十数万百姓自发相送，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当时在网上看了大量文献，心内震动。最近在网上看了当时的视频，更是感叹深思，心情复杂。如果要找一个万民爱戴的地方官，两千年中国历史上，无人能出张钦礼之右！1949年后任何一个先进干部典型，无人能及张钦礼！他与去年垮台的薄熙来完全不同。在共产党内，薄一类的人也不少，他只是个典型。但他非公开的言行与共产党公开的意识形态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拿共产党的本义来评估他，他不仅不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而且是共产党的敌人。而张钦礼则是另外一类共产党人。他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标准的共产党员和标准的基层领导干部。在某种意义上，他比共产党干部中迄今为止最光辉的典型焦裕禄还要典型。正是因为共产党内有张钦礼这样的干部，它曾经得到中国许多老百姓的真心拥护。

今天，可能我不会完全赞同张钦礼过去一些言行（这些言行从前可能是光荣正确也是为我所肯定的），但仍然对他怀着敬意。有三个重要的理由：第一，是缘于我在历史上与1960年河南大饥荒事件的几次相遇，这种相遇使得我判别人和事时有它作为重要坐标；第二，是我相信并非河南文革当事人的穆青看人的眼光。80年代时，他作为新华社社长和党内开明知识分子，作为当初焦裕禄长篇通讯的原作者，作为平反复出的文革受害者，在彻底否定文革的背景下，仍然对因为文革表现而在文革后坐大牢的张钦礼，丝毫不改当年的礼敬。我后来得知，全国记协于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等地三次召开全国会议，均特邀没有平反的“劳改释放犯”张钦礼与会，坐主席台并讲话。张的发言多次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第三，我更相信普通中国人的集体眼光。看老百姓送张钦礼下葬的视频，感觉情之深甚至超过周恩来，也超过海瑞。我相信，中国历史上再难以找到其他地方官，

能获得超过张钦礼的人民爱戴。几十万人发自内心的爱，没有什么官方力量可以相比。撇开中国政治派别斗争的因素，张钦礼乃是二千年政治史上最了不起的地方官之一。官民关系和感情达到这样的程度，在传统政治形态中乃是最高峰。

张钦礼等人的命运，以及全国大饥荒饿死人责任者和揭露者的命运，对文革与大饥荒关系的自由派解释提出了有力的质疑。我盼望看到更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

就我个人观点，张钦礼现象和党言川现象早已经超越了文革造反与保守两派的斗争，不仅如此，它还超越了1949年后中共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并且进一步超越了国共两党的斗争。它们涉及的是关于真相和正义、人权和人性、生命权和政治统治等更基本范畴的争论和探讨。

参考文献：

- 1、杨继绳：五十年前的信阳事件
- 2、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 3、百度百科：张钦礼，吴芝圃条目

【阅史漫笔】

这故事我在课堂上讲了二十年

张一哲

2009年，李九莲遇难32周年之际，连续写了3篇博文。发表后屡被删帖，只好一再修改重发。文章主要针对的是官式文革叙事的弊端，并非我关于文革的全面观点阐述。

李九莲、钟海源的故事我在课堂上讲了20年。

从1988年到2007年，在每一轮马恩哲学原著课里，我都会用几分钟给学生讲述李九莲和钟海源的故事：

江西赣州三中毕业的青年李九莲，1969年给她已参军的男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讲了对林彪的怀疑。料不到她的男友为了入党提干，把“情书”交给了领导，于是她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关进牢房。林彪垮台以后，她被释放出来，但仍被当“贱人”看待。1974年，她为自己的冤屈辩解，却被重新关进监狱。到1977年12月，也就是文革结束一年之后，被以“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罪名枪毙。死前用竹签插入她的喉咙，家属不敢收尸。一个流氓把她的乳房和阴部割下来用盐水腌着……当年成千上万为李九莲鸣不平的干部群众，或被整肃，或进监牢。与李九莲素不相识的弱女子钟海源，仅仅因为替李九莲鸣不平且拒不认错也在1978年遭枪杀。为了给一名高干子弟换肾，在刑场上将还活着的钟海源的肾挖出来移植，其血腥味甚至让行刑的武警都难以忍受……

1977年12月下旬的一天，我在江西省吉安市中山场（现在已经成了繁华的步行街了）附近的墙上，看到一张布告，上面大大的红笔打勾非常醒目。这是枪毙的告示。上前一看，是李九莲的名字。刺骨的寒风中，我站在那儿把布告读了好多遍，企图从中间揣摩出某种政策信息，究竟是大开杀戒还是杀一儆百。

那时候，在江西，由于议论华国锋而以恶毒攻击华主席罪名被揪出来隔离、审查、批判、斗争以至于关进监狱的，是成千上万啊！文革后的媒体文章经常说到文革中以“公安六条”来定的“恶攻罪”，但以我自己的耳闻目睹，在江西，整个文革十年的“恶攻罪”人数加起来，也没有文革后那短短一年间“恶攻华主席”的人多啊！

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这场大规模的运动，我至今在任何“正式”媒体上见不到反思的只言片字。

记得1977年上半年我曾经问一位时正得宠的官员，我们共同认识和短暂共事过的某位朋友的近况，他无奈而又沉重地说，据说涉及到“四个指向”。我因此知道这位老兄处境凶险，也因此知道了所谓“四个指向”罪名的内涵，那就是斗争矛头指向华主席、党中央、大庆、大寨。

说说大庆和大寨的怪话坏话就是反革命，今天听来是如此荒诞，但当年这却是因大庆会战而升任中央某高官总结出来并被高层认可，登在报上的。几年后，我得知我的一位著名的作家朋友居然就是因为反大寨的罪名而曾身陷囹圄。但对于江西来说，我所听闻的，有些私下非毛的人都没有太大风险，只有对华国锋的不恭，绝对会招杀身之祸。

谁能说得出来，在1977年，有多少人因“恶攻华主席”被批斗甚至坐牢？至少，我认识的年轻人就有不少。我记得看过一个文字材料，是吉安一个著名的劳动模范，被判了15年。这个材料集中地反映出，怎么利用互相隔离逼诱口供的方式，套出他们在1976年10月曾经私下议论过华国锋的言论，然后按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罪名定案的过程。

仅我视野所及，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人被隔离审查，甚至车间一级也可以随意剥夺人身权利。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被车间隔离审查的。他文革开始是初一学生，1977年也只有23岁，文革中他自己和全家人都是保守派，也就是站在此时“正确”不被挨整的一边。他又是全厂公认的第一劳动模范和好人，他也没有任何“恶攻”言行。连那些“隔离”他的人都不讳言承认，隔离审查他的目的，就是要逼他交代他交的朋友中还有什么人攻击了那位英明领袖。

为什么要集中寻找甚至诱供有关攻击华国锋的材料呢？那是因为，有这一条就可以致人死命。

1980年戴煌发在新华社《内参》送给胡耀邦看的文章，题目就是“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这是抓住了关键。胡耀邦和戴煌这两个人多不简单！要知道，此时，华国锋头上还顶着中共中央主席的帽子啊！

1977年2月22日，华国锋下发了中发〔1977〕六号文件，指示：“对攻击

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份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正是有了这个文件，才处死了李九莲和钟海源。

这年6月，我也被一桩所谓“恶毒攻击华主席”的诬陷所牵连。1974年，我在北京接触了一些反对“四人帮”并预言他们会垮台的人，他们的提醒使得我在随后两年的反复和动荡中谨慎又谨慎，不仅与运动绝缘，而且在最可能议论华国锋从而导致横祸的那短短的半个月之内，完全无辫子可抓。但是，还是有一个杀身危险擦身而过。

在毛泽东还在世时，我中学母校的几个教师曾路过我家短暂地坐了几分钟。其中一人后来被揪出来，其罪状是曾向梁效写信。不过，他所写信的内容据说只是告吉安一中工宣队搞不正之风，因而并不容易整出什么大动静，当然只能靠“逼”、“供”、“信”的文革手段了。结果，在某日半夜，他终于顶不住，无奈乱供，说那天在我家议论过华国锋。这种在程世清的“三查”中屡见不鲜的迫害恶招此时普遍死灰复燃。好在那天毛还在世，“四人帮”还在台上，华国锋也还没成为英明领袖，完全不具备当年10月份才出现的大规模议论华国锋的历史条件。而在具备这种条件的日子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他的口供没有在场其他几人任何旁证而且在时间上逻辑上自相矛盾，实在难以成立。但我仍然挨整、被审查、写交代，戴上攻击英明领袖的嫌疑帽子，并且三次被剥夺参加高考的权利。

1980年我考研时，又有人寄匿名信告我议论过英明领袖。虽然此时冤案早已否定，仍致使我高分而落榜。为此，我曾起草过一封给华国锋的信，信中说，且不说我并没有议论过您，即使议论过，是否就可以永远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呢？反复考虑，由于担心华的“文革”还没结束，况且我的信可能到不了他的手上，反而因此招致新的灾祸，写好的信才一直没有寄出。幸运的是，我的申诉信到了胡耀邦手中。1981年春天，中国青年报报道我被重新录取的消息。

戴煌的文章说，有50多人因恶攻华国锋的罪名被枪毙。那么坐牢的呢？至今不见公布，那该是个多大的数字！更不要提大量的则是单位隔离审查的人数了。

在中国历史上，新皇登基，往往大赦天下。而华国锋上台伊始，却大开杀戒。我真不知道这位貌似老实的新主，是智商人品出了问题，还是被他人转嫁了罪责。

鬼使神差。李九莲遇难20年后，我偶然有了一个机会，到了那位英明领袖下台后幽居的院子。半夜醒来，想起20年前那个随意草菅人命不可一世的人物，现在居然就在我附近，还没有我自由，不禁想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话。第二天我问明这位幽居老人的散步习惯，很想当面问一问他：至少在江西，对“议论”过他的老百姓进行大规模镇压甚至虐杀，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思？

只是熟知中国政治的内幕与潜规则，又被友人极力劝阻，才放弃了这一莽撞之举。

【阅史漫笔】

从李九莲是造反派头头说起

张一哲

看到这个题目时，很可能多数读者会以为我要说李九莲的负面信息了。

如今中国的所谓左派和右派都会以不同方式解读这一点。但我的解读与他们都不同。

很多肯定和歌颂李九莲、钟海源的人，特别是许多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完全否定文革造反派。但他们是否知道，他们讴歌的这两位都是造反派呢？

所以，在这里我要首先强调这一点，李九莲是赣州三中卫东彪兵团的副团长，也就是说，她曾经是个“响当当”（文革语言）的文革造反派，而且是个中学生造反派头头。

被官式文革叙事遮蔽、扭曲的真相

李九莲、钟海源是造反派的代表，她们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命运，是和整个造反派的命运相联系、相一致的。虐杀她们的正是最恨文革造反派的力量，同时也是文革中搞极左最厉害、文革后也曾宣称否定文革的那股力量。这是李九莲悲剧的实质，也是“李调会”悲剧的实质。海外的“两个文革说”是部分解释这个表面看来荒诞现象的思路之一，但我觉得它的概念和论证都还欠严密，这里暂不详述。

为李九莲翻案的人，都不提这一茬。这在当年为李九莲平反昭雪时是完全正确的策略。他们显然是有意忽略或避免涉及李九莲这一身份。他们知道，“造反派”当年（甚至到现在也一直）是“历史反革命”的同义语，提及这一点会给李九莲平反增添巨大阻力。

我自己每年在课堂上和学生讲述李九莲，我也从不提及她的造反派身份。因为我的学生毫无疑问都是在妖魔化造反派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

但镇压李九莲的人却非常清楚并且强调这一点。

戴煌回忆，在赣州调查时，地委书记杜昭坚持认为李九莲是“现行反革命”，他还说，她“即使不是反革命，也是硬骨头造反派”。这表明，在杜昭们心目中，只要认定李九莲是造反派，杀她就没什么错。

戴煌还说：“胡耀邦作了批示，李九莲等人被平反。但迫害她们的人全部都在台上，没有一个下来的。”什么原因，他没有说。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李九莲是造反派，而迫害他的人都是以镇压造反派为功劳上台的。

参加造反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李九莲文革前是学生会部长，学习成绩优秀。

现在许多人以为造反红卫兵都是些学习成绩差、品德不好、调皮捣蛋的学生，其实，一般情况恰恰相反。就我的经历所知，不仅我所在学校，其他我了解过情况的学校，学习尖子多数都是造反派。而且越是重点学校越是造反派多。（这一点，在我读过的杜钧福先生的文章中有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

至于为什么这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宠儿”反而造反？我想，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因为运动初期（从1966年5月16日之后的50天）各级党委把大批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打成“反革命”（黑帮、右派学生、小爬虫等等），这些人后来在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下起来造反；第二是因为1966年所谓“红八月”时期，以所谓阶级路线为旗号的血统论大泛滥，而造反派当年是在反血统论中壮大起来的。这两点就造成了文革造反与1949年前造反最大的不同：不是穷人和文化程度低的倾向于造反，而是恰恰相反，造反派闹腾得厉害的地方，往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比如高校和科研单位等。而多数农民，以及多数穿上军装的农民和部分穿上工装的农民，是反对造反派的主要力量，是保守派的基本力量。

这本来是事实和逻辑非常清晰的史实，却让官式文革叙事弄得混乱不堪，让如今60岁以下的人就颇易迷糊，50岁以下的人则很不容易明白真相。就连民间最有声誉的报纸《南方周末》也受此官式叙事影响很大。前几年，我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一个奇怪的回忆场面：把喊着“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血统论红卫兵干的事情，说成是造反派的罪状。那大概是个年轻编辑，他不知道文革造反派就是以反血统论为主要旗帜的。还有，《南周》登过季羨林儿子季承写的文章《我和父亲季羨林》。原文说文革初期“共产党各级组织”整群众的“黑材料”，这里原书中的“共产党各级组织”几个字在《南方周末》发表时被编辑改成“造反派”。这样的改动被“毛左”抓住辫子。显然，这种不经当事人同意而又完全歪曲历史的改动，是没有任何可以辩解的理由的。但我相信编辑犯错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无知而不是存心篡改真相。在这一代人所接受的信息中，很自然认为整群众的黑材料只可能是造反派而不可能是共产党各级组织。他们完全不知道一个文革历史的常识：正是因为“共产党各级组织”整群众“黑材料”，才使得这些被整的人起来造反，起来反政治迫害（实际上就是争基本人权）。我后来专门仔细查阅了《南周》这篇文章，发现把“共产党各级组织”几个字改成“造反派”之后，前后文内容完全不协调。但这一点也许没经历那一段运动的人并不容易发现。所以有时候就有点悲观，原来篡改历史是很容易的呀！

为了让小于60岁的人和年轻一点的自由派理解这一点，我举一些人物为例来说明。

除了李九莲，如今被誉为思想先驱的张志新文革初期也造过反；被誉为中国良心的刘宾雁也倾向造反，文革后造反派被妖魔化后我还看到他的回忆谈话中坦然提到这一点。还有，令人尊敬的否定文革、对文革有深入反思和研究的哲学家王若水，文革初期也造过反。文革后许多知名的作家，比如北岛、蒋子龙、戴晴、柯云路、钱理群等人，当年也都参加过造反派。

我的学生以为，最不可能造反的就是科学家。为此，我想举一些著名科学家的例子。

我想，著名科学家、后来在罗布泊失踪的彭加木，他的人品了不起，应该争议比较小吧？而他在文革中也是造反派。当年他参加造反派的时候，我印象非常

深刻。因为文革前，他的事迹就深深感动过我。

姚桐斌的例子更有典型意义。这位当时中国最有潜力的年轻科学家，死后几十年仍然被追封为“两弹元勋”之一。我对姚桐斌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高中毕业于当时位于我的家乡吉安青原山的国立十三中，后来又考取我大舅舅本科就读的唐山交大，算是我舅舅的校友学弟。而且，姚桐斌就读本科时，唐山交大迁到贵州，我舅舅从美国留学回来后那时正在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任教授。姚这些经历使我感到亲切；另一个原因是文革后笼统地说他文革中受迫害“被造反派打死”，引起我的关注和疑惑。我后来读到一些史料，说打死姚桐斌的凶手一直没有受到追究，文革之后还在争取入党，在最高层领导人的直接关注下才被追究。这就使得我高度怀疑凶手是造反派这个信息的可靠性。另外，我还读到杨国宇的《将军军管日记》，对此有一些记载，但语焉不详。其中似乎说，在武斗中“姚桐斌被 915 殴打致死”。这里，被 915 打死，说明凶手是保守派而不是造反派（文革中我就知道七机部的两大派群众组织 915 是保守派，916 是造反派）。杨当时在七机部负责军管，这个信息是准确的，也很重要。此外，我看到姚桐斌夫人的回忆文章，说姚是在家里而不是在武斗现场被打死的，这说明根本不存在姚桐斌参加武斗的可能性。杨将军日记行文的含糊和上下文联系很容易误导读者。我后来有机会亲自采访到七机部一位退休高级工程师，他在文革中与姚桐斌是同事，也是同观点的。终于明确，凶手不是造反派而是与造反派对立派别的。我才明白，为什么在文革后将造反派一律当作所谓“三种人”追查时，凶手不仅不被追究，还可能被重用。而且如果不是姚桐斌如此著名而重要的身份，这个凶手恐怕还不会被追究。那次采访我还意外得知，姚桐斌本人当年也是“916”观点的，也就是说，姚桐斌本人，是著名年轻科学家中倾向造反派的人（我没有进一步确证他是否也像彭加木那样参加了造反派组织）。

最近，人民网发表了姚桐斌夫人彭洁清的文章，原题为《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的一生》，但编辑却将题目改为《两弹元勋姚桐斌文革被造反派用钢棍砸死》。亲历过文革的科学家杜钧福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分析这个标题张冠李戴的错误，建议将题目《两弹元勋姚桐斌文革被造反派用钢棍砸死》改为《造反派姚桐斌文革被保守派用钢棍砸死》。于是，我们又见到一个和《南方周末》编辑犯同样错误的人民网编辑（我这里善意地隐去了他的名字但我希望他本人能看到这篇文章）。不过，我相信他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故意颠倒黑白，而更多是无知而未必是无耻。这种无知来源于受官式文革叙事的影响。我自己上网去看这篇文章，发现姚夫人是尊重事实的，是非常严谨的，她的原文中没有一句话涉及到造反派三个字。很奇怪，编辑根据什么加上那样一个标题呢？我猜，文中提到凶手时，有一个词“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可能是这位编辑灵感的触发点。但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应该知道，这个词正是一个典型的反造反派用语，多数情况下都是保守派的自称。比如我们江西省全省的保守派联盟组织名称，就是用的这个词。如果是我看到这个词，毫无疑问就会怀疑（当然不能断定）凶手是保守派成员。但如今的青年人，也许多数会毫不犹豫地认为他们就是造反派。这可见官式文革叙

事多么深入人心啊！也可见文革历史被歪曲的程度，远超过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的正统叙事。

（补记：姚夫人于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给时任七机部部长的宋任穷写信，要求找出杀害姚桐斌的幕后策划者，要求追认姚桐斌为烈士。后一要求当时为邓小平亲自批准很快落实，前一个要求她自己也觉得一时难以实现。我后来查阅过大量姚桐斌的资料信息，特别是看过一本《姚桐斌传》，才明白这件事情水太深。据这本传记说，尽管周恩来当时亲自指示查处，后来又过问几次，一直到1974年夏天凶手才被正式逮捕。此时距离姚桐斌被害已经6年。而且是由于姚夫人坚持不懈地申诉，才由李先念批示，公安部长华国锋报告，由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和纪登奎这些人都圈了圈以后，才逮捕于某某、高某某两名直接案犯。

经历过文革的老人都会知道，1968年冬天之后，造反派被整是全国性的普遍情况，北京和中央机关又是首当其冲，而国防系统对造反派整肃之厉害更是全国领先。如果两位凶手是造反派，会有这么大的查处难度吗？即使一般的保皇党成员，恐怕也不会如此之难吧？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是，在1974年被逮捕之后，又过了五年，一直到1979年，在姚夫人不屈的追诉下，凶手才被判刑。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人的案件，查清案情会有那么难吗？我前几年了解到，在七机部工作的叶挺将军之子，曾在中央文件中被毛泽东称为左派，文革后也仅仅因为是916造反派的头头而被开除党籍。那么查处916对立面的915中的两个普通工人身份的凶手，又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查处阻力呢？最令人奇怪的是，凶手刑满出狱之后，居然双双转干、被评为先进，其中之一还要被发展入党。任何对中国文革后国情哪怕有丝毫了解的人，会相信他们曾经是文革造反派吗？

只要看看两位前台打手的命运，就完全可以理解，在中国国情下，姚夫人要实现追究幕后策划者的愿望实在是比登天还难了。）

罗广斌是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这一点广为人知。但他是文革造反派这一点现在则鲜为人知。我看过一篇他儿子在长大成人后写的《怀念爸爸罗广斌》的文章。这篇回忆父亲的文章，有三处提到造反派。第一处：造反派通知说：“罗广斌跳楼自杀！”第二处：造反派让妈妈签字火化爸爸的遗体，妈妈坚持不查清死因决不签字。第三处：造反派把妈妈关进了市文联的一间临时牢房。毫无疑问，这里的造反派就是文革中凶手和坏人的代名词。但是，非常清楚的是，罗广斌当年是著名的造反派。其著名程度，使我这个远离四川千里之外的中学生都为他的革命造反事迹所感动，并为他的惨死而愤怒。看了他儿子今天的文章，真令人啼笑皆非。我想问的是：他是否知道，他父亲才是当年真正的响当当的造反派，而且是造反派负责人？他是否知道，他父亲当年的造反派“同伙”，无一例外在文革中就遭到整肃和镇压？不仅是《红岩》另一作者杨益言，也不仅仅是他父亲的造反派战友黄廉（那个曾被毛泽东提到名字，曾被江青扬言要介绍入党的著名老造反），而是绝大多数和他父亲一起造反的人。甚至包括（现在说是）直接置他父亲于死地的“815”派也无法幸免。可以肯定地说，告诉他父亲惨死故事的人，

隐瞒了若干关键事实，从而构造了另一个历史故事，与真实历史不同的伪文革史。而亲历历史的人，包括他的亲人和熟人长辈，都按照官式叙事来配合并默认了这样的隐瞒和改写历史。这个典型事例又一次说明隐瞒大量关键事实的官式文革叙事会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记忆。

我曾经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过著名哲学教授李达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的故事。课后我的学生对我说，他看过的一篇李达传记说的是“一群臂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冲进李达家中对他进行抄家、批斗”。我告诉他，这是纯粹的编造。因为李达受批判时，不仅武汉大学没有造反派，全中国的造反派都还没有出世。要么就是伪造，要么就是张冠李戴。（我今天上网搜索，才发现伪造造反派批斗李达的叙事充斥媒体。）事实上，当时主事迫害李达的，正是后来造反派批判的那几个“走资派”；积极参与迫害李达、反对为李达平反的，也正是造反派的对立面；相反，包括李达的助手和同事在内，同情李达尊敬李达的，则是武汉大学的造反派。我的学生望着我很有些奇怪，这显然与他所接受的文革理论不符合。我于是再加问他一句，知道萧蓬父、陶德麟吗？因为他们是文革后的知名哲学教授，所以我点了他们的名字。学生说，当然知道。我说，他们就是保李达的造反派骨干。

要指出的是，李达的情况并不是特例。文革初期，各省点名批判的黑帮和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都是被党委抛出来的，而后来在所谓批判资反路线阶段崛起的造反派，正是与此相对立的势力。像我的学生所读过的这种编造历史的传记，是目前已经出版的文革读物的主流。在大量的涉及文革的影视作品中，也充斥着这类篡改历史的镜头。把文革初期造反派还没有出现时的整知识分子罪恶，把1968年冬天之后、造反派已经被镇压下去之后的文革罪恶，甚至以整造反派为主要内容的文革中的那些运动，比如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等等的反人权罪恶，通通加到造反派头上。很显然，这种张冠李戴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系统性的造假。稍有常识的人就会明白，这种系统性的信息污染是系统本身有问题。

在今天的青年看来，最不可能参加造反派的，还有那些著名的学术权威。我想，季羨林的例子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生前曾经被捧为国宝级大师的季羨林，写过一本真正的畅销书《牛棚杂忆》。不是我喜欢苛求大师，这虽然是本很好的文革回忆录，但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他述说了文革中他的受难经历，却始终不明说自己文革中参加了造反派。事实是，他不仅参加了北大的一派造反组织《井冈山》，而且是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勤务员，即造反派头头。季羨林后来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到迫害，他一生都没有忘记那些苦难日子。但是他却回避了一个关键的事实：他在“牛棚”受难的大部分时间，北大的造反派组织，无论是他所参加的“井冈山”还是他所反对的“新北大公社”，都已经事实上不存在，领导权完全是掌握在官方的军宣队工宣队手中。而且，就在他在劳改大院受难时，两派造反派中的多数骨干同时也在受审查。他这样做也许不是故意掩盖或歪曲历史，但毫无疑问，他脑子里的文革史观，基本上是以官式文革叙事为纲的。人们如果仔细看这本书就会发现，季羨林在文革中的经历与造反派兴衰的关系：文革初，他是“反动权威”而受批判时，造反派或者受压或者还没出世；批资反路线

时，造反派兴起，他就没事了，也就是他书中专门写的《快活半年》一章。到1967年夏秋之交，他参加造反派组织，其中部分经历见书中《自己跳出来》一章。当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季羨林一参加井冈山兵团，或者是由于他的地位和威望，在北大的影响，立即被选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像他这样年龄，这样著名的教授，公开宣布参加某一造反组织也许并非个别，但担任造反派组织领导职务，这在北大除了周培源以外，则并非普遍。后来他被揪出来，随后不久造反派就垮台了。等他政治上解放时，甚至1976年他写批邓的文章时，造反派却没有翻身，或者说，一直到今天也没有翻身。十几年前，我参加厦门的北大校友会一次春游，被会长介绍给一位著名企业家，会长戏称他是当年井冈山的“坏头头”。那次我们聊天，主要还是涉及我与之通过信的周培源。据“坏头头”告诉我，周算是校一级的头头，在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组织上退出“井冈山”。关于系一级的头头季羨林，我们就谈得很少。但季先生文革造反的经历，尤其是他担任过东语系勤务员的信息，如今在网上中国毕竟是很容易知晓的。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季羨林的一儿一女文革中均参加造反派，季承先生还被选进了“二机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勤务组，也算是个造反派头头。这一点，季承先生如今是很坦然地公开承认的。

其实，像季承这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参加造反派不是稀有而是常例。人们只要稍微仔细一点看看季承和季羨林本人的回忆，就很容易明白，他们参加造反派完全是顺理成章的，和他们的经历尤其是文革初的经历完全对路的事情。这样的情况，在官式文革叙事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报刊编辑，很可能不知道。所以才会理所当然地擅自修改季羨林儿子讲常识真话的文章。

官式文革叙事由于得到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不自觉的传播，其影响也波及海外。我曾经看过海外民运刊物《北京之春》上一篇文章，说1967年湖南道县杀人的是造反派。还有不少海外人士，也把文革中广西大规模杀人甚至吃人的凶手误以为是造反派。海外的文人如今把血腥镇压造反派的那些杀人凶手冠上造反派的名号，这种张冠李戴颠倒黑白的说法，很可能也只是受官式文革叙事模式的影响，但它的恶劣影响可见一斑。

为李九莲平反的过程中，回避和淡化其造反派身份是合适的策略，但从长远来说，没必要继续回避。李九莲和钟海源已经是历史人物，她们的价值特别是她们牺牲的价值，都远远在文革和当代中国政治派别的划分之上。

李九莲的造反派身份，让人们明白造反红卫兵与血统论红卫兵的区别。让人们明白，文革那些血腥的暴力究竟更多是来自李九莲这样的造反派娃娃们，还是来自她们的对立面。让人们明白，反对武斗的李九莲是造反派，而热衷武斗甚至最后将娃娃们枪杀的是她们的对立面。让人们明白，那些热衷于血统论、热衷于“打”“砸”“抢”的某些红卫兵现在成了大款和高官，他们打人整人的恶名却转嫁到了象李九莲那样反对武斗的造反派身上，从而对那个伪文革叙事引起怀疑并进而从受蒙骗中清醒过来。

李九莲首次反思的那场“武斗”其实是对造反派血腥镇压

江西著名作家胡平，是最早写李九莲的。在《中国的眸子》一书中，他两次提到李九莲对文革的反思。那是在 80 年代，因此公开出版的著作当然无法违背文革的官式叙事。但我们现在很容易从胡平的记述回到历史现场。

胡平指出，最早引起李九莲反思文革的是赣州那场大武斗。

胡平在书中描述了那场大规模武斗的部分惨状，但他回避（或者并不知道？）最重要的真相：赣州大武斗其实是武装镇压造反派。是江西文革中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

在 1967 年早春，全国多数地方发生了“二月镇反”运动。这场所谓镇反，与 1966 年夏天大规模把学生群众打成反革命一样，是文革侵犯人权的重大事件。因为责任人不是文革后批判的“四人帮”势力，所以，成了官式文革叙事故意忽略的两大文革事件。对此，我从未见过官媒上的只言片语，国内也少见自由派和左派对此的评述。

争取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获释，是 1967 年整个春夏江西某一派群众的主要活动。李九莲当时就参加了为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中学生造反派舒北斗的 5000 人大绝食。其他地方不论，1967 年春夏江西的武斗，赣州的武斗，主要就是阻挠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和获得基本人权。相对应于赣州的“6·29”大武斗，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吉安，则有围剿造反派的“6·26”事件，也是一样的大武斗。在柯云路的文化小说《芙蓉国》里，专门有一章描述首都红卫兵在赣江上受到保守派围剿的故事。其中的渊源在于，就在 1967 年 6 月 26 日，突破重围的吉安造反派，乘船队从吉安“逃往”南昌，沿途受到武装围剿。柯云路此时和一批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就在船上。而我的北京 101 中的朋友文智奇，则在途中中弹受伤。

当时，江西的保守派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因为保守派当时的社会基础更多是农民，或者说是那些最受益于血统论的农民干部或积极分子，以及那些地方掌权者轻易（仅用“10 工分”“政策”而不必付钱）就可以调动的农民。对此，毛当时表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农村包围城市”是反动口号。

当时掌权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官员发明了一个应该上历史书的“高招”，就是让四乡的农民每天记 10 个工分去参加围剿造反派的武斗。类比今天的“五毛党”，我把这些农民称为“10 工分派”。22 年之后，这种官员的继承人使出同类损招，出点小钱（当年的工分其实就是一点小钱）让京郊的农民进城游行表示拥护“戒严”。其实这一次和从前一样，政府也是要镇压新的造反而已。尽管一些当事人想尽力撇清自己与文革造反派的关系，但在掌握枪杆子的人眼里，两者是一模一样的。

武斗是文革研究（包括海外的文革研究）最薄弱的一环。尽管有少数信息和证据被采用，但是系统研究却太缺乏。因此我们今天还不能根据系统的可靠信息基础上的研究来讨论，但我觉得有几个非常简单的切入点可以思考和分析问题：

- 1、武斗对谁有利？谁有优势？
- 2、武斗的地点通常在哪儿？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有军队（不仅是武力，还包括执掌地方权力）支持的保守派有武斗优势。武斗对他们最有利。

第二个问题的意义在于，武斗发生地点往往是被动一方所在地。比如，我所在的江西省吉安市，自1967年5月开始，武斗就不断。有心人总结出一个规律，那就是发生地总是在地区卫校及其周围。地区卫校当时是造反派的集聚地。既然如此，上门来武斗的应该是主动方，而守在家门口的应该是被动方。否则，打人的天天在家里等挨打者上门来找打挨，挨打的天天送上门去挨打，这样荒唐的事情会发生吗？那么，谁是武斗的挑起者，需要很高的智商才能判断吗？

赣州6·29武斗及其前后的江西省武斗，促使毛、周直接派外省部队入赣制止武斗。这也是毛泽东当时提出要武装左派的背景。济南部队和广州部队进入江西之后，抚州发生支持保守派的地方武装人员的抵制，周恩来将其定性为叛乱，直接命令野战部队平息之。如今这些当年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被官式文革叙事屏蔽，仅仅把在老毛“武装左派”指示背景下提出“文攻武卫”的江青当做了替罪羊，把她喊这个口号定为大规模武斗的原因。这个逻辑根本不能解释，为什么江西省大规模的武斗，最残酷的死人最多的武斗，会在6月份发生？难道7月份（江青7月22日发表赞同“文攻武卫”口号的讲话）发生的事情，会是6月份发生的事情的原因吗？难道结果会在原因之前吗？不需要高深的哲学讨论，常识就可以告诉我们，原因只能在结果之前。即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与赣州和江西省对造反派的镇压同类的，还有后来更加残酷的广西大屠杀和湖南道县大屠杀。从前我认为，如果要为这种屠杀辩护，就等于为蒋介石的“4·12”大屠杀辩护。今天我明白了，广西等地的大屠杀，在某种程度上比“4·12”还要蔑视人权。这是因为文革造反乃是奉旨（不仅奉泽东大帝的旨，而且是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旨）造反，程序上是“合法”的，而且还因为文革造反远没有1927年的造反那么激烈。

文革前，我一直不太理解毛对历史上的“让步政策”的否定。是目睹文革中对造反派的镇压，从此对中国历史上让步政策的有无真假有了顿悟，使我对毛断然否定的缘由有了一些感性体会，也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残酷和黑暗有了透视的机会。

李九莲是造反派，1974年为李翻案的都是造反派，1977年镇压李九莲等人也就是镇压造反派，这是问题后面的实质。

在当下中国统治话语下，这是一个也许不便明说的事情。但是，你如果坚信李九莲没有错，坚信虐杀李九莲、钟海源是错误的，你就不能永远回避这一点，你就必须正面解释这件事情。

李九莲再次反思文革的“三查”也是镇压造反派的运动

1967年的武斗并没有把江西造反派全部打趴，反而走向它的反面，武斗之后一个月，造反派在毛中央的支持下取得胜利。是一年之后，程世清靠着其他几个战役，特别是“三查”运动，才把江西造反派基本上打下去的。

在《中国的眸子》中，胡平描述了当年赣州的“三查”运动，特别是瑞金、兴国等地的“大屠杀”。胡平认为，这引起李九莲对文革的再次反思。

我与李九莲同是江西省 66 届老高三毕业生，与李九莲一样，我们对程世清的不满，最早就是源于对“三查”的不同看法。可以说，文革最黑暗的一页，将来最经不起历史审查的，不是斗走资派，而是清理阶级队伍，清查 516 等运动，在江西就是“三查”运动。今天看来，江西文革中的“三查”运动，整人无所不用其极，死人无以计数。这是程世清最大的罪错，是江西 1949 年后规模最大的人权灾难，也是促使李九莲一代人愤怒和觉醒的主要事件。

我读到胡平书中所写赣南的群体性暴力和遍地开花的假案，特别是所谓“反共救国军”假案，触动我的记忆。这种所谓阶级斗争是如此雷同，当年我所在的吉安也是如此。记得有一个著名的吉安县“反共救国军”假案，牵扯大批干部群众，甚至包括文革前已经上调中央的干部，就是后来那些欢呼枪毙李九莲的人炮制出来的。我认识的一位与钟海源性格类似的女性造反派，仗义自费上京告状，幸运成功，解救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其中有一位文革前夕已上调中央机关的干部对她的救命之恩感激涕零。尽管如此，1977 年她也遭受了与钟海源等人类似的命运，判刑坐牢，一直到李九莲平反后才出狱。

文革暴力，特别是死人，有两个高潮。第一个是文革初期的 1966 年 8 月前后，即血统论最猖獗的所谓“红八月”时期。卞仲耘和老舍等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死或自杀，就是这个时期，北京大兴县的屠村事件，也发生在这个时期；第二个高潮，是 1968 年下半年至 1971 年前后，这个时期是文革死人最多的时期。至于这个暴力致死的责任者是谁，我仅说一个简单事实：前一时期，造反派组织还没出世，后一时期，造反派组织基本解散或者被镇压下去。而文革后多数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和影视作品，却总是掩盖或篡改这个基本历史背景。比如，有本很著名的书说，“九大”是造反派的会议。这个奇谈怪论有很多追随者。这个结论不顾一个基本事实，“九大”召开时，除开上海和极个别省份，造反派组织已经全部解散，头头和骨干多数已经被整肃，有的甚至已经关起来，一般只在革委会留下少数“花瓶”式的代表。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 1968 年 8 月毛泽东正式抛弃北京学生领袖之后，而有的地方或部门则更早，例如外交部，早在 1967 年秋天造反派就已经被整肃（最近看到长期担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老人的文章，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实际上多数省份镇压造反派的军政要员们倒都是“九大”主席团成员。仅以江西（类似江西情况的不是少数）为例，镇压造反派的程世清就是江西代表团团长。如果这样的组成也可以说是“造反派的会议”，那“造反派”的意思是什么呢？

两派都是造反派的说法导致的混乱

前面针对官式文革叙事的歪曲，指出大量文革罪错其实不是造反派而是他们的对立面干的。对此，文革后出来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说文革中的两派都是造反派。

首先，这是一个过于简单、容易导致混乱的说法。

造反这个词有它最基本的含义，它必须是矛头向上（是向着强权）的，且造反行为往往是有风险的。在这种意义上，文革中的保守派与造反派是不难分清的。文革初期造反派普遍受压时，他们的对立面是强大的保守派。保守派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背后有当权派的支持。除了极少数时间和地点，文革中的保守派并不具备通常意义的保守精神或保守思想（这种保守是有其独立价值的），许多情况下也未必一定是通常意义上的保守观点持有人，而只是某种类似于御林军的力量。打个比方说，文革中的保守派，有点像如今的“五毛党”。有多少优秀分子甘心做“五毛”呢？

我们知道，文革造反派在处境改变之后也因闹派性而分成不同派别。有的是因为更温和或更激进而产生分歧，有的则是因为对于具体人物和事件的不同看法产生分歧。在这种视野里，我们可以说北京的“天派”和“地派”都是造反派，可以说“新北大公社”和北大“井冈山”两派都是造反派，也可以说清华的“团派”和“414”两派都是造反派。但我们绝不能说北京的“西纠”和“联动”是造反派。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工总司和上柴联司两派都是造反派，但绝不可说上海的工人赤卫队是造反派；也绝不能说湖北的百万雄师和江西的联络总站是造反派。这里不来讨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是非，仅说明区分两派的标准。打个不准确的比方，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经是革命党不是不可以，但必须明确这个说法适用的时间地点。比方说，你可以说毛同志领导的1927年秋收暴动是造反，但不可以说此前蒋先生主事的镇压造反的“4·12”事变也是造反。拿现在的事情来打比方，你可以说杨佳杀警察是造反，但你不能说警察打杨佳是造反；你可以说小贩反抗城管是造反，但你不能说城管打小贩是造反。

其次，这个说法很容易被利用来歪曲历史、掩盖历史真相。

事实上，这个说法后来起了两个很奇特的作用：在舆论上，文革中的保守派在走资派和军头支持下所干的打砸抢和侵犯人权的罪错，就被张冠李戴地全部转嫁给造反派了；而另一方面，干下这些坏事的人，在当局实际的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却是以反造反派的身份出现的，因此他们的罪错也很容易地就逃脱了惩罚。对于保守派中的少数坏人来说，所有群体的文革罪错都可以挂在当年的对立面身上，而个体则可以以非造反派的身份逃脱审查和追究。所以，这个说法真是个坏人通吃通赢的“创造”。

说到这里，有必要简单谈谈邓、胡、赵三人对造反派的不同态度。

一个人一阵子造反不等于一辈子造反。历代造反者大多是半生造反，一旦上台就镇压造反。毛似乎是终生造反（还需要具体分析，此处暂不论），历史上的农民领袖他是特例。毛的多数同事与历代造反者一样，是半生造反半生镇压造反。邓大人在有次谈到华国锋时很轻蔑地说了一句“造反起家嘛”。这句话中透出邓本人对文革造反派的某种独特认知。

首先，邓先生在说这个词时完全忘记了他自己就是造反起家的。也就是说，他完全隔断了他年轻时造反的历史，这也是他将毛领导的两次造反完全割断截然

分开的理性或潜意识原因。当他造国民党的反时，他认为那是正义的革命的；当他被当成文革造反对象时，他理所当然的是将造反完全否定的。

尽管这种观念普遍地存在于许多共产党的官员身上，但他们却不会把华国锋划入文革造反起家的行列。

华国锋年轻时和邓一样确实是造反起家的，那时他造的是国民党的反。而文革中华国锋并不像刘建勋、纪登奎等人那样，支持过造反或与造反派共过患难，不能算是支持造反的领导干部。他只不过在离开湖南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得知毛中央的态度后才发表了与时俱进的表态声明（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算是造反）。此后他既没有善待湖南造反派（将著名造反派杨小凯投入监狱就是他的“功劳”），也没有与当权派眼中的中央“造反派”结盟，并且在毛死后将他们悉数投入监狱。在他执政期间，发动了对全国造反派的围剿，其中李九莲和钟海源的被杀正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这样一个镇压文革造反派功勋卓著的官员，也被邓大人轻蔑地指为“造反起家”，从中就可以体会他心里的造反起家究竟是什么含义了：邓是把文革中崛起或得益的一切人都看成了造反派。

比如说，文革中崛起的某些军头，是打击刘邓势力的一支主力。在这方面，他们的积极性和得益不亚于江青、张春桥势力。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镇压文革造反派的主力，是文革保守派的后台。正如邱会作所回忆的，许世友他们向毛表态，拥护文化大革命，反对造反派。对于这样一支镇压文革造反派的主力，在邓心目中却也是趁机造他的反的力量。这样的定位，在邓心理上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在客观观察文革派性的角度，在文革造反派这个词的普通意义甚至最广义理解的意义上，都是名实不符的。

正是在同样的心理定位上，邓将华国锋看成是造反起家的。与此类似，在邓看来，汪东兴、吴德等人也都是造反起家的。我们知道，汪东兴、吴德等人其实都是起劲地打压造反派的高级干部，而且在粉碎“四人帮”的政治斗争中是主力。除了文革一开始就倒台的邓，很少有人会把他们看做造反起家的人。

还有一类文革新贵，比如迟群、谢静宜和庄则栋，在邓小平时代也被许多人归为造反派或造反起家的人。直到今天，海外舆论也常常这么理解，比如傅高义先生最近的大著《邓小平时代》书中就是这么理解的。但其实，迟群、谢静宜去清华、北大本来就是去镇压造反派的，文革中他们也从来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或造反派组织。他们不但不是造反起家，恰恰相反，他们是靠镇压造反派起家的；而庄则栋又有所不同。他文革中算是比较著名的保守派，为此受到周恩来批评，作为文革前就是他的粉丝的我，当时还真替他着急。他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小球转动大球”的中美乒乓外交中的作用，完全与造反无关。顺便指出，像庄则栋这一类文革前的先进模范人物，文革中多数没有参加造反派，他们大都在1968年底造反派垮台之后作为工农兵的代表人物逐渐回归政治舞台或者说重新崛起，成为持保守立场的干部平衡文革势力的主力。北京的倪志福、江西的赵志坚等等都是这一类。无论政坛还是民间，极少有人会误将他们看做造反派。而庄则栋恐怕主要是与江青有一点交往而被误当做造反派了。

邓的看法有一些客观原因。作为文革中较早挨批较早垮台的他，不仅造反派，也没有任何保守派组织曾经保过他。在他眼里，几乎没有文革保守派这个概念。这一点对于邓来说构成了他与多数“走资派”的区别。

在这种意义上，他把文革中的保守派也看成造反派。这种看法虽然并不符合事实，然而，一方面，在他本人亲历的意义上并非毫无道理；另一方面，在后来的历史中也显出某些影响：其一，当文革后保守派的骨干大量被重用，邓本人并不赞同或热衷。当胡耀邦“彻底否定文革”的口号也伤及不少文革保守派精英时，邓大人没有像某些人那样伸出援手（除了对他们自己的子弟）。这方面，邓看中文革中的逍遥派或说中间派，比如他选中王兆国就是这个思路的产物；其二，邓后来一直把他所谓自由化分子和文革造反派同等看待，在风波那年更是集中表现出来。邓比其他人眼光更锐利之处，某种程度也与他的文革经历有关。

党内另一大佬 C 的看法与邓也有相似处。据传 C 当年有个指示：清华的团派是造反派，不能用；414 也是造反派，也不可重用。这个意见是针对“有自由化倾向”的 414 派罗征启而发的，也许给人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然而，这位彻底否定文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却对比“414”打砸抢严重十倍的联动分子青睐有加，认为他们是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应当进入接班的第三梯队。看来，对独立思考 and 造反自由化之间的天然联系，两位大佬比其他领导人还是更清醒的。

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当年胡、赵的态度。我看过原体改所头头的一篇回忆，他曾对胡说过，如果自己不是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革命”，他也会参加造反派。胡有一次和他长谈中了解到不少造反派真相的信息，态度非常开明。他不赞成文革造反，但也不赞成后来那样整造反派。据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在他的回忆录《岁月流沙》中披露，1983 年胡耀邦就说过，从前，我不赞成把蒯大富他们捧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蒯大富他们整得这么狠。曾为胡耀邦所欣赏的中央党校的阮铭等人，就被某些元老痛骂为造反派。

赵紫阳的开明态度与胡类似。我所读过的资料，赵紫阳当年在广州就对造反派相对宽容，为此还受到仇恨造反派的黄永胜之流的责难。赵紫阳后来所欣赏的改革派智囊，也不乏被指为文革造反的人物。

不赞成文革造反，却能客观看待一时参与造反的年轻人，并且不拘一格使用虽曾造反后已觉悟的改革闯将。这是前台的胡、赵与两宫太后的明显区别。

肯定 1949 年前造反却否定 1966 年造反的矛盾

为了正确理解和评价李九莲这样的文革造反派，我想从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两个不同的立场和坐标来做些讨论。

毛自己说一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 1949 年前的革命；第二件事情是文化大革命。

目前在中国大陆，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毛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伟大正确的，毛干的第二件事情是错误的。与此相联系的观点是，跟着毛干第一件事情的革命者是光荣正确的，跟着毛干第二件事情的人则评价不同：文革造反派是错误的，

与造反派对立的其他人则往往是正确的至少自诩是光荣正确的。不仅官方如此，民间持这种观点的人也相当多。

跟着毛干第一件事情的许多人，在毛干的第二件事情即文革中受到打击，当他们重新掌权之后，他们的利益逻辑或立场逻辑就是全面肯定第一件事情且全面否定第二件事情。直接受造反派批判的当权派和某些军头，自然恨造反派；在文革中受难的大量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多数文革苦难不是造反派加予的，但在官方文革叙事的多年洗脑后，多数也一古脑地妖魔化造反派了。

文革造反派与 1949 年前的造反者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之一是，两次造反的领导人都是毛，公开宣称的指导思想也是毛思想。

官方认为指导文革的毛思想是毛晚年的错误思想，为此甚至荒唐地把毛晚年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这种做法对于执政党在政治上有策略合理性，但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存在困难，此处不详论。在我看来，毛早年与晚年思想是有些不同，但毛晚年思想还是他中年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毛在文革中保留了他革命话语的高度权威性和合法性，重要原因乃是他的文革话语与他终生思想也即中共革命话语一贯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自由思想家王力雄认为毛的文革理论乃是毛主义之所以成立的“原创”，我是赞成的。没有文革理论，只能是毛思想而不是毛主义。当然怎么评价毛主义是另一回事。

参加文革的大量群众，都是参照毛干的第一次事情来理解革命，并且作激励榜样的。当时理解的所谓反修防修，不过就是不让第一次革命成果丧失，不让革命者堕落为第一次革命对象那样，不让人民重新跌落到第一次革命前的境地。

文革中我毫不怀疑文革造反就是井冈山造反的继续。否定文革后，起初我跟随官方理论把二者完全对立和区分开来，后来经过反思才明确，前者与后者的正确与错误在大的方面是相似的。而不一致的地方，倒未必是重新上台的当权派所主张的那些差异。

文革造反在大的方面是照着第一次革命的模式造反，而且更多是照着官方理论和宣传中的那个革命模式。等到文革之后有机会接触许多新信息，我才慢慢知道，其实，第一次革命造反还远不如文革造反（同时也不如 1949 年后宣传的）“理想”和“温良”。在文革中我们见到那么多不符合“政策”或不符合道义的行为，这些东西后来成为否定和追究它的根据，而其实这些东西在第一个革命中更多得多，也更严重得多。仅仅想一点就很容易明白这道理：毛泽东和他的同事费了多大劲，才把一个以农民为主的武装改造成一支纪律比较严明的军队。

因此，人们现在对文革的多数指责，都可用在第一次革命上，对文革造反派的指责之处也多数可以在 1949 年前的造反者身上找到。不同之处仅在于，1949 年前的造反者不少人在 1966 年成了造反对象，他们不能容忍也不能理解这种变化。他们忘记了，他们当年造反的对象国民党，早先也是革命造反者，国民党在沦为造反对象时同样也不能容忍共产党的造反。

与 1949 年前的革命造反相比，文革造反派是“奉旨”造反，因而在程序上更有合法性。他们并不颠覆政府，与通常的推翻政权的革命不同；更少暴力色彩，

更不用说诉诸武装力量（至于文革中的武斗和其他暴力，需要专门讨论，它的真相也一直是被歪曲的），其注重政策等方面的表现，与第一次革命更有纪律的后期相近。可以说，文革造反派与镇压他们的军头们参加的农民造反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它更像西方 1968 年的学生造反。（顺便指出，遍及西方世界 1968 年的学潮正是中国文革造反所激发的。这一点似乎也被许多自由主义者所忽视。）

除了毛领导的两次造反，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还发生过无数次农民造反。曾经被毛意识形态定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农民造反，现在遭到中国许多历史学家的质疑。仔细论起来，参加毛领导第一次造反的农民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更相像，大体上都是要打江山坐江山，推翻一个政权再建立一个政权。而参加文革造反的学生、工人造反派，则更像是一次时间稍长一点的学潮、工潮（最长也就一年多吧）。

比较起来，文革造反其实是 20 世纪的所有造反革命中最温和理性的，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温和理性的，甚至，也是唯一真正“奉旨造反”的（历史上的奉旨造反绝没有这次的合法性程度）。海外有些文革研究者为了回答右翼自由派贬低“奉旨造反”或者从右面拔高文革造反的意义，提出了“借机造反”的说法。其实，即使有“借机”的意思，在程序合法性方面还是可以说是“奉旨”的。所以，即使按照文革后媒体妖魔化的造反派形象，文革造反派也比历史上的一切造反者（包括他的近亲——1949 年前的共产革命青年）要更“文明”和温和一些。

1968 年，毛自己说，文革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把文革当做毛干的第一件事情的继续，文革中各派当时都没有挑战毛的这一说法，但在具体理解上，则包含有两种不同的斗争方向：矛头向上和矛头向下。这里的关键差异，是各方都把资产阶级这个词赋予了自己的理解：矛头向下这一派，是在“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种意义上理解资产阶级；矛头向上这一派，则是把共产党内的当权派（走资派）当做了蜕化成国民党的新生资产阶级。具体说来，在毛心里，刘少奇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在许多当权派（包括军头）眼中，资产阶级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和知识分子；造反派是将欺压民众的当权派当做资产阶级，而其对立面则把地富反坏右以及造反派本身当成了文革的对象。文革初期，造反派把刘少奇当做资产阶级，这一方面是由刘少奇在运动初期的镇压学潮表现造成的，同时又是被毛的批资反路线强化和印证的。因此，这时造反派与毛是一致的。到 1968 年下半年之后，造反派的对立面就逐渐占了上风。有一点要指出：文革的最大特点虽然是矛头向上的群众运动，但文革中多数时间，运动的矛头往往是向下的。记得 1968 年时我们与程世清的根本分歧就是围绕着“三查”运动的方向即“对人民是保护还是镇压”的不同理解展开的，这也是当时我们发表“五七意见”的背景。现在来看，文革中矛头向下（主要是对地富反坏右和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斗争）这一派，更多地继承了毛所领导的第一次革命中的负面因素；而矛头向上的这一派，则利用了毛批资反路线和反走资派的旗号，更多地举起了反政治迫害、反特权、追求社会公正的旗帜。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文革的学生造反比 1949 年前的农民造反包含更多的合理性因素。

记得有一次，与一位思想解放的“12·9”一代老人聊天。说起来，我们在文革中参加的学生运动是受他们当年学生运动的启发鼓舞，我们文革后的觉悟，也受到他们先觉的启蒙。但有一点我们略有分歧，他完全肯定他们当年反国民党的学运却彻底否定文革学生运动。他的理由是文革中毛错刘对，因而文革造反就一无是处。我对他的说法并不全反对也不全赞成，觉得他的思维中有某种误区。至少，刘少奇说“要做党的绝对驯服工具”不能说是全对的吧？造反派批判他的“驯服工具论”不能说是全错了吧？当时我突然冒出一句反问，如果完全肯定从前你们参加的学生运动而彻底否定文革中的学生造反，就先要证明刘少奇远远好于高于蒋介石。尽管当时我心里并不认为1949年前的造反和文革造反的区别能简单用反对蒋介石和刘少奇来比拟。

换一个老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我面对的这位思想解放的老教授，居然一下子就被我问住了。他的思维一下子卡壳了，不回答我的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都在一个重新认识、审视现代史的过程中。刘少奇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当然不是文革中全民批判时那样；同时，蒋先生的形象也在变化中，大量新信息新观念正在同时影响我们。我的逻辑是，如果不能肯定蒋先生比刘同志更坏，或者，不能证明刘同志比蒋先生更好，又怎么能肯定反对蒋先生的学潮就一定对，而文革批资反路线的学潮就一无是处呢？

破坏法制（治）的责任应该全由造反派担吗？

破坏法制（治）常常是今天的自由派对文革造反派的一个指责。在承认这个指责有一定道理的同时，我想补充说明几点。

第一、文革造反是在没有法治的社会里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应该作为观察和讨论的前提。即使今天，文革过去快50年，中国仍然不是一个法治社会。难道哪一位自由派先生会认为当年毛同志和刘同志共同领导下的是个法治社会吗？难道谁会以为刘同志诸人是一些依法治国的人吗？很显然，文革造反派造反的背景和对象既然并不是普通自由派所认可的法治社会和领导人，为什么仅仅用这个标准评价造反者而不要求对方呢？

第二、当年文革的造反，是毛中央开会决定的，是根据一系列中央文件行动的。换句话说，虽然有一些趁机干坏事甚至犯罪的人，但总体上是符合彼时的法制的。须要指出的是，这些文革文件，不仅刘邓，其他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当权派们都是投了赞成票的。这些人自己或者同意（心里想的或许只是为了整别人，没想到后来自己也挨整），或者心里虽然不同意，但却不敢反对而是投赞成票。无论哪种情况，首先应该心中有愧，为何现在却只是反过来怪罪听他们文件照他们文件办事的人呢？退一万步说，后来他们觉悟了，认为从前的文件是错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只能是公开承认错误，废止从前的文件或所谓法条。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是在新的法条生效之后的罪错才予以制裁，决不能对从前按照你们官方文件办事的人予以制裁呀！这应该是法制（治）甚或做领导的常识呀！至于沿用毛泽东的“两条路线斗争”或者如今的所谓“党内健康力量”的说法，

把文革罪错仅仅归之于林彪、“四人帮”，即将责任归于党内少数坏人而执政党整体上不承担（反而证明了伟大光荣和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这是法治社会的现象吗？

第三、文革中的专案审查是侵害人权的重要方式，也是不依法治国的重要表现。但是，除了极少数地方，主持和参与这些专案的力量，都不仅不是造反派，而且大多是镇压造反派的力量。这个基本事实眼下被官式文革叙事所忽略、掩盖或歪曲，让普通人形成印象，似乎审查干部或知识分子的专案大都是由造反派主持的。

还应该指出，专案审查这种有严重弊病的制度和思维，以及依附这种审查的逼、供、信等方式，也是破坏司法独立造成司法不公和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这种专案审查和逼供信早在文革前几十年就存在于共产党内，文革后也没有结束。只要将眼下媒体公开的文革后特别是近十年的大量冤假错案仔细梳理一下就可以看出，文革专案组制造冤案的传统，无论从方法甚或是人员都继承和传续下来了。而将文革破坏法治的罪责和根源仅仅归于文革造反派，正是没有真正从文革错误中吸取教训而走上依法治国新路的重要原因。

“砸烂公检法”是毛文革的一个口号，人们从中可以观察到文革破坏法制的某种现象。如果我们不能从现代法治的理念来清理文革错误，而是从专制和镇压造反的思路来坚持错误，那么，“砸烂公检法”这样的口号，就会在当代再次引发呼应，例如，很容易在视杨佳为大侠的许多人心中产生共鸣。

为什么文革造反派比 1957 年右派下场更惨

在一些自由派的文革话语中，文革造反派与 1957 的右派，似乎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但其实，造反派与右派具有共同的历史基因，其社会根源、政治思想特征和整体命运变迁，非常相似。文革初期（所谓资反路线时期）的“二次反右”，正是文革造反派产生的直接原因。在后来的造反运动中，有相当数量的右派或直接参与或内心支持，曾经的右派后来的异见者刘宾雁、白桦等人，都有这种思想经历（全国著名的湖南日报社右派群体，或许是最值得研究的）。而在 1968 年及其后的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造反派群体的命运，总体上步了 1957 年右派悲惨命运的后尘。不同点，是造反派造反的时间长于右派鸣放时间，也因此，文革造反派遭遇了比右派更深的迫害和灾难。

在这种意义上，文革造反派其实是 1966 年的右派，而右派不过是 1957 年的造反派。

可以从自由主义右派的角度来比较两者在思想和行为后果方面的异同。

海外有些右翼人士认为，造反派从根本上是维护共产党毛泽东的，因而是维护极权的。不错，就总体而言，造反派基本上是在中共当时既定政治路线的规范和指引之下，按照自己的利益倾向和思想判断而投入文革运动的，他们只是批判部分党内当权派，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图。但是我们今天看绝大部分右派 1957 年的言论，也只是针对具体的党领导人提意见，

根本不是要否定或推翻共产党。从思想上来说，1957年的右派中，除了几个大右派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右派，其余绝大多数其实是“被右派”。但如果就批判和提意见的勇气、全面性，就运动的广泛性、尖锐性和规模上来比较，1957年右派其实是不如文革造反派的。

从思想高度说，1966年的文革造反派不如1957年的高层右派，但强过多数基层右派。1966年的形势，与1957年有根本的差异。最重要的是思想资源在代际环境方面的差异。1957年的少数大右派有1949年前和国外的经历，而1966年的造反派是在封闭的思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思想高度一时不如1957年的大右派是容易理解的。但在反政治迫害的斗争过程中，他们中间也必定会有人沿着独立思考争民主自由的道路往前走。事实上，1968年开始就有了许多迹象和趋势，造反派中出现过质疑、挑战统治意识形态的异端思潮（这是否是毛抛弃造反派的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假以时日，造反派中必然会出现与1957年高级右派比肩甚至超越他们的人物，例如杨小凯和后来的许多自由派名人。李九莲本人是另一类典型，极权体制的维护者虐杀她，正是因为她身上有所谓造反派的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

海外有些论者（例如著名作家郑义等）认为，文革造反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反共大起义。这个说法夸大了造反派的造反程度和边界，但就它对体制和权贵的造反激烈和打击程度来说，确实是远甚1957年右派的。我想，这一点，在当权派的眼里是毫无疑问的。

与1957年右派不同的，是文革造反派卷入了毛发动和领导的倒刘的斗争。从今天自由派的观点看，这是造反派洗不干净的错误。对此，我总体上先不持异议，但想补充一些说明。

第一、是刘少奇整人在先，造反派反击在后。文革初期，刘少奇按照1957年反右的思路领导运动，把大批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其比例甚至超过了1957年（顺便指出，刘本人对1957年反右是积极的并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搞白色恐怖，宣称镇压学生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并且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起来批判刘少奇的文革路线。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起来争取烧毁黑材料、平反，其实是争取基本人权、争取自己宪法权利的正义行动。有些党内右派认为，刘少奇运动初期派工作组等行为，是毛所设的陷阱，无论刘少奇怎样做，毛都会把他打倒。对此，我在这里不想细论。你可以说毛是利用了刘少奇的错误，但不能反过来否认刘的错误。毛固然利用了造反派，但正如杨小凯所言，造反派也利用了毛来反政治迫害。在观察中国政治时，“利用”这个词是个中性词而并非贬义词。

第二、即使按照自由派的立场，造反派的错误，也只是在毛的战略部署指引下，越过行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边界，走向正确的反面。然而，这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指出来：造反派还在受压，造反派组织普遍没有出世时，刘少奇已经在中央全会上失去有实权的二把手职务而被降为毫无实权的第八名位置。而最后将刘少奇置于死地的，也并不是造反派，而是共产党内高层权力斗争中的另一派。

刘少奇的专案组是谁具体负责的？刘少奇的罪名和罪状是什么人定的？把刘少奇开除党籍彻底打倒是哪些人举手的？是造反派吗？不是。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时，造反派已经被毛所抛弃，已被趁倒刘之机夺权的军头镇压。是包括毛、周在内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决定共同举手将刘送上了不归路。

刘少奇是个悲剧性人物。他不只是死在党内毛派的手上，更是死在他自己奋斗终生积极建立的制度上。是他率先开创了党内造神的风气，是他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党内多次运动和全社会的政治运动中，积极剥夺对手的基本人权。因此，当他被他造的神定为全民公敌时，当他的基本人权被剥夺时，能指望谁来保护他呢？

第三、当年有谁保过刘少奇？在当时全国一片喊打声中，只有人数极少的两种人保过他。第一种是当初被称为“保爹保妈派”的少数高干子弟。这些人几乎是依靠本能而在 1966 年 8 月前后的短暂时期内并不旗帜鲜明地保过他。可惜的是，他们，其中也包括刘少奇自己的家人，很快就抛弃了他。这部分得归因于刘少奇本人早年造神的功劳。第二种人，人数很少，与刘少奇非亲非故，但却为刘鸣不平。这其中居然就有像李九莲这样的造反派。

最后，在自由右派的立场上，造反派这个错误的性质及其程度，可以和共产党反对国民党进行比较。如果比较国民党和共产党内的右翼专制者（区别于左翼专制者），比较刘少奇与蒋介石，未必可以得出造反派错误更大的结论。

如果文革造反派掌权时间足够，大体上会步此前革命党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无例外）蜕变的老路，其中少数坚持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会成为牺牲者。没有宪政民主的体制，很难有别的可能性。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机会掌权，因而也都有机会蜕变。造反派没有执政就被镇压下去，没有机会掌权，所以也没有机会干更多错事（少数地方有程度不一、长短不一的掌权机会，蜕变机会往往随之出现）。因此，造反派被镇压，是不幸也是幸事。集体被镇压，使他们戴上了类似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和右派同命运，却因此而少做了错事。

我们这一代最有才气也曾经是文革造反派的杨小凯说过，造反派半是天使半是野兽。反政治迫害时是天使，被极权利用时是野兽。

我要补充两点：

第一，由于被极权利用的时间很短就被镇压下去，多数造反派尤其是其中的学生造反派和“出身不好”的造反派还来不及变成野兽；

第二，对于不同品性的个人，差别极大。有李九莲这样坚持独立思考反政治迫害的造反派，也有曾招银这样倒向极权告密投机的造反派。李九莲更多天使气质，曾招银则更多野兽味。

有一种逻辑，既然文革要全盘否定，那么作为参与文革的积极分子造反派当然也应该全盘否定。对此，很有必要强调的事实是：在 1949 年后各次政治运动中（包括 1957 年“反右”）的积极分子，一贯都被重用着，即使在历史证明他们有错，而且官方也已认错改错之后，他们也都被精心保护着。而文革中的造反派下场却很惨，在毛时代多数就已经被打压下去，毛死后更遭彻底镇压。如果他们

是依附毛泽东和共产党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为什么会成为 1949 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唯一不仅不被保护，而且在运动进行中就被抛弃和镇压，在文革后更被官方权贵镇压和诋毁的群体呢？在中共各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唯一只有造反派没有受到重用和保护，难道精英们的脑子还不会稍微想想这个例外的怪事吗？

我认为，这个例外，恰恰是最有分量的历史证明。其实，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并非完全没有被保护下来的。但是保护下来的不是造反派，而是听党委话的那些保守派，是按照党的传统思想行动的工作组、工宣队、军宣队，是参与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和“一打三反”的那些积极分子，是那些搞专案（当然，专案对象必须是文革后没掌权的当权派）的积极分子。所以，在当权派（和保守派）心中，文革造反派类似于 1957 年的右派，不仅文革初期是如此，文革后也是如此。

然而，在反对派方面，情况正好相反。1989 年学潮中，当年的弄潮儿都看不起造反派，大都想撇清自己与造反派的关系。但是，邓大人清楚得很，在他看来，这就是文革造反的重演。当时各地“维稳”部门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暗查所谓“三种人”的动态。正如文革开始造反的人，都努力撇清与 1957 年右派的关系一样，尽管当年右派不少人心向造反派。等到后来右派平反，又轮到这些翻身的右派撇清与造反派的关系了。1989 学潮中的精英们在这点上也不比造反派高明。对此，杨小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民主运动之所以没有连续性，每次都重起炉灶，原因在于都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撇清自己与其先辈的血缘关系。

造反派一方面对毛盲从，另一方面也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反叛；一方面是奉旨造反，另一方面被利用后很快遭抛弃。在吞食了盲从的苦果后，沿着反叛和怀疑之路走向觉醒，正是这一代青年的精神历程。我们看到，文革造反恰恰成为这代人扬弃造反思维走向民主宪政的精神契机。

造反派在文革中的表现当然有错误。我这里之所以强调的是另一面，一是针对官式文革叙事的掩盖与歪曲真相，二是强调，虽然那些学生娃娃有错，但对他们的镇压是更大的错。

反对江西林彪余孽导致造反派与走资派结盟

李九莲第二次坐牢，是程世清余孽所主导。它的背景之一是当时江西三全会期间开始形成了涂（烈）、万（里浪）两派。万派与涂派的主要分歧点，是要不要进一步批林（主要是林彪在江西的代理人程世清）。万里浪 1968 年被程世清投入监狱，此时刚刚出来，涂烈则是程世清的亲信和已被清查过的林彪“驸马”候选人。是否清算林彪的账，在 1974 年的江西是区分政治态度的最重要坐标。万里浪本人并无支持李九莲翻案的表现，但由于他与李九莲都是被程世清镇压的，所以涂烈势力天然反对李九莲平反的。赣州市的程世清余孽和涂派分子也是如此。

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反造反派都是林彪势力的共性和骄傲点所在。看邱会

作等人的回忆录和为林彪翻案的许多文章，都会看到贯穿始终的这种自证正确的反造反派自豪感。从人权的价值角度来评价，林彪麾下的军人和造反派都有错。但比较起来，我认为军人的错误更大。尤其是当年的“江西王”程世清，可以说欠下了巨大的人权债务，在1949年后江西省的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74年到1977年，共同对付程世清余孽这一共同点，使得江西省仍然留存在革委会内的少数“万派”造反派头头与江西的省级走资派达成共识并一时结盟。

70年代时反林彪及其代理人程世清，是江西造反派的普遍情绪。其重要原因在于，江西造反派是程世清而不是走资派镇压下去的，所以，他们对程世清势力的仇恨远大于走资派。而且，在对程世清所代表的势力斗争过程中，万派造反派头头对所谓走资派有了新的感觉和认识。比较这两股力量，他们觉得林彪的力量更不能信任和依靠，对林彪的路线更不能认同，程世清之类的人物他们更不能接受。如果一定要在这两者之间取舍，他们不会选林彪力量。这是我对万派与走资派结盟原因的观察。

文革中，一部分所谓“走资派”对于直接置他们于死地的林彪势力是警惕和内心痛恨的。而在1974年，江西省级官员中的这股势力对于清查和打击江西的林彪势力，有清醒的盘算和动力。此时，他们也需要利用虽然已经被打压下去但仍然具有巨大群众基础和能量的造反派，这是双方结盟的基础。

在政治上妥协、与非主要敌手结盟以等待时机，对于江西“走资派”来说，是一种老练、圆滑或成熟，而对于造反派头头，则是一种痛定思痛之后的现实理性选择。

在文革中各省的不同时期，尤其是“一月夺权”后、清理阶级队伍、成立革委会等时期，造反派头头中都有一些人倒向地方实力权势者，或者投靠军方。但江西的情况与此不同。它发生在林彪垮台后对其余孽的斗争过程并延伸好些年，而且不只是基于少数头头的个人利益比如官位的考量，而是相当一批人从上到下形成某种明显的结盟，这在全国，即使不是唯一，也是极罕见的。目前我还没有听闻过第二例，也没有见到有文献披露。这件事很值得文革学者深入研究。

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万派头目与省级走资派在政坛互相联系互相来往互相呼应和配合。一直到1977年春天，此时“四人帮”已经垮台，但我参加江西省工业学大庆会议时，还能明显看到此类政治图景。此后形势大变，完全超出双方可能影响和控制的范围，新的政治变动和平衡终于打破和结束这种结盟，万里浪等人再次被投入监狱。

回望历史，对于江西万里浪之类的人物，他们一生的命运其实在1966或1967年听从毛的号召起来造反之后就已经注定结局悲惨无可更改。即使他们能够及早醒悟，即使有先知先觉者指点迷津，即使决心与后来胜利的走资派结盟到底，都难以改变灭顶之灾的后果。这是他们的宿命。他们不可能像1968年欧洲和日本学潮中的造反者那样，不仅有机会融入主流社会，而且可以重登政治舞台。他们的宿命其实是这个非宪政体制内一切异端者的宿命。

如果要问，1974年后与走资派结盟的万里浪他们还是造反派吗？这个问题与下面的问题是同一类型并且相关的：此时或后来的走资派们还是原来的共产党吗？也许，按照通常的概念和逻辑，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但在眼下中国大陆的语境和逻辑里，这个问题我暂时还难以回答。

有什么比造反派更不让人惭愧的组织我可以参加呢

记得十几年前，有一次参加省哲学年会期间，聊天中一位中年副教授问我，你文革中参加过造反派，现在是否感到惭愧？

我脱口而出：你参加共产党都不觉得惭愧，我参加造反派为什么要惭愧呢？

面对一脸惊愕的她，我缓和语气反问道：按照你所认同的逻辑，造反派的后台不是林彪、“四人帮”吗？他们当年不是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吗？照你刚才的逻辑，你现在是否因此觉得你参加共产党惭愧呢？

同样的逻辑，林彪曾经是军队的领导人，在文革中也有某些军队官员极“左”很厉害，难道你现在可以随便问一军人“你参军惭愧吗”？

真要按照这种逻辑推论起来，中国人里有汉奸卖国贼，有十恶不赦之徒，我就需要因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惭愧吗？难道因为希特勒、萨达姆都是人，我们就应该因为自己是人而羞愧吗？

也许，被这种逻辑所俘虏，生活在天朝的我也不能免俗。曾经有几年我看电视新闻常有一种羞愧感觉，类似于自己家里有人说假话干亏心事。这种感觉来自一种错误的心理定势，好像大家都是中国人，甚至他们还在外面代表我们。过了一些年才完全平静下来，因为与他们已经完全切割了：他们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个人反思文革经历可以高要求，也可以问自己对文革经历是否惭愧，但你不可对他人如此这般发问。因为人只能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假如文革造反派中有人干了荒唐事情或者罪恶滔天的事情，与我并不相干时，我需要为此负责吗？很简单的道理，造反派中普通一员不必为其他造反派的行为负责，正如作为普通党员的张志新不必为林彪、“四人帮”的行为负责一样。

在革命的视野里，李九莲参加造反派与毛泽东参加国民党、宋庆龄参加共产党没什么两样。因此，李九莲曾参加造反派，没什么丢脸。就像毛曾参加国民党，就像宋曾参加共产党不丢脸一样。在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20年代，很多人参加共产党，也有很多人参加国民党，其中不少人都是热血青年，都是想救国救民。相当多数人，政治理想、党派立场、思想主义，多次变化反复，完全不能用一种简化了的意识形态标准来判断。但到1949年后，凡是参加国民党的都是历史污点。文革期间审查人的历史，仅仅与国民党人的个人来往就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后，凡是参加造反派也都成了历史污点。但这种思维观念是完全错误的。李九莲参加过造反派，完全不是历史问题。就像吴敬琏参加过造反派不算历史问题，就像林昭参加过共产党也不是历史问题。说到底，历史问题这个词本身就是文革类（我之所以加上这个“类”字，是因为这种思维早就存在，并不自文革始）思维的产物。

世界上的多数人也许难逃统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官式文革史观的笼罩下，我虽然明知自己参加造反派过程中甚至并没有做过任何官方追究的错事坏事，但仍然长期讳言自己年轻时曾经参加造反派这一事实。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对文革的反思层层深入，我才彻底突破官式文革史观的束缚，对于我年轻时遭遇的那个“革命”和造反，对于各色人等的文革表现，才有了新的觉悟。

文革中和文革后，我们都被审查无数遍。那些审查，通通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现在也都不为我所认同。面对历史老人，我不认为我做了多少像那位哲学副教授所以为的应该惭愧的事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1957 年被打成右派的人，除极少数人之外，多数都为自己的右派身份而惭愧。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还保留这种惭愧了，相反，其中不少人反而感到自豪。我想说，同样，仅仅是为反政治迫害、争取基本人权而参与文革造反的人，现在就不必为曾经的造反派身份羞愧，加在李九莲、钟海源身上那些诬蔑不实之词，一点也不比当年加在右派身上那些颠倒是非的东西更有合理性。

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使得文革造反派背负如同抗日的国民党人被视为“历史反革命”一样的政治包袱，羞愧而压抑。当然，文革造反与抗日，在多数国人心都无法相提并论，我这里也只在处境的某一共同点上比拟。不过，仔细想来，两者天上地下的评价就那么理所当然吗？抗日虽然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大旗下显得崇高，而文革造反在反政治迫害、争基本人权的视野里，其实也具有相当长远的正面价值意义。

在思想上真正否定文革后几十年，我不认为自己如今在道德上高于年轻时。成熟当然好于幼稚，但也许会失去另一些宝贵东西，比如勇气和赤诚。我参加造反派那几个月，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反政治迫害，争取基本人权。而且是以极其温和完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的，而且是既合乎执政者的法律和政策，也合乎中国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不到一年的造反，给我十几年的灾难。说实话，我现在也不敢说，其他那些受难的日子，就一定比造反这几个月更不惭愧。在我一生中，令自己惭愧的，肯定不是那几个月。至少，我没有感觉到，我现在的处世态度，会比那时候更光荣，或者更不惭愧。说到底，今天我坚守的只是不踩底线（不同流合污）的低标准，这有什么道德优越感可以夸耀呢？

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我还真反思过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感叹幼稚和后悔的心情也确实有。然而今天，如果真要讨论这位哲学教师的所谓文革惭愧，我要说，无论是站在什么立场，比如毛的立场，或是官方文革史观的立场，或者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拿那些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来相比，无论是中流砥柱那位，还是被迫害致死的那位，还是反文革的那位头号英雄，更别论那些所谓反文革的军头了，在我心里，没有一个应该比我更不惭愧的。

我并不认为儿时穿开裆裤是件什么光荣事情，可我也并不为此惭愧。同样，我现在并不认为参加造反派是个多光荣的事情，但我也并不为此惭愧。说实话，我现在还真想不出，在我所生活的时代，究竟有什么比造反派更不让人惭愧的组

织我可以去参加呢。

（有必要指出，以上的逻辑反驳，都建立在现有官方思维关于文革责任的基础上。如果按普世政治逻辑，作为执政党并且实际上控制全社会的共产党不能以党内派系斗争或路线斗争之类的理由为自己的文革错误免责，不能以自己内部出了林彪、“四人帮”之类的坏人为自己的文革错误免责。而且，作为执政党成员当然有责任为自己的党所犯的错误担责，更不用说党的高级领导人了。在这种意义上，为文革中人民遭遇的一切人权灾难而愧疚，也应当是一个党员应有之良知心态。所以，面对一名现在仍在党内的共产党员对一名曾经的造反派成员发出文革是否惭愧的质疑，我真实的感觉不是个人的无脑而是全社会无脑。）

因思想言论而被惩罚都是践踏基本人权

当年枪杀李九莲的人还有一条理由：就是她承认“在毛主席逝世时”说过“寄希望于江青”的话。这样为“四人帮”鸣不平，还不应该镇压吗？

这一条令很多爱护李九莲的人尴尬，仿佛也难以为她辩解。

有一种辩护是这样的：如果能更多公开真相，如果允许保留不同意见，假以时日，等到改革开放，李九莲还会为江青鸣冤叫屈吗？

当年造过反的许多年轻人，后来不都成了反思文革的前驱，或者成了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吗？既然，当年的造反派郭罗基、戴晴、徐友渔等人后来成了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既然李九莲当年的思想密友、造反派朱毅今天也成了自由派的铁杆人物，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假定李九莲若不被处死后来会顺着她的逻辑思路解放思想而批判江青呢？

这可以是一种辩护，但毕竟是一种弱辩护。因为辩护的理由是建立在可能发生而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上。

而在我看来，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剥夺一切信息知悉权，却要求人们对一个给定的结论只能表示热烈拥护的态度，如果不拥护或者要求知情权就封杀你镇压你，这种做法，无论用什么花言巧语伪装，都是一种野蛮落后，都是一种专制。

其实，无论李九莲说了什么话，在当年和今天看来有什么对错，抓她坐牢并且枪毙都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凡是仅因思想和言论而被惩罚甚至处死，就是剥夺基本人权，就是专制和野蛮统治。

不过，我这里还要从另一角度为李九莲一辩。

假定李九莲当年对毛也许还是大体肯定的（说“黄昏的太阳”之类还不足以说她已经达到了非毛的程度，这一点与林昭不同），从这一逻辑出发，怀疑华国锋甚至为“四人帮”鸣不平只是当年的一种“常识”推导的结果。

回到当年封闭的中国现场，与李九莲的常识思维不同的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人数很少，但头脑清醒。他们反对“四人帮”也反对毛泽东。他们从“四人帮”垮台看到了中国变化的希望；

第二种人是党内部分权贵及其子女。对他们来说，党是特权利益的合法外衣，而毛是江山合法性的化身，也是他们合法性利益的符号代表。他们是毛的第一场

革命的受益者，第二场革命的受害者。他们恨江青主要是因为利益。他们反对“四人帮”，而且明白毛是其后台，因而从策略出发，肯定毛而否定江青。他们是一批自觉的行动者，也是当年中国政坛的实力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华国锋其实是评估了实力之后而投靠了他们；

第三种人是大多数，他们是一些典型的中国特色没有常识和逻辑的人，或者说没有脑子的人，相信华国锋抓毛的遗孀是所谓“继承毛主席遗志”。华国锋等人是这类谎言的源泉，他们自己当然是不会相信的，但在中国搞政治的人从来都是说假话脸不红心不跳血压不升高的。

我起初心里对华国锋是信疑参半的。一方面我有常识，另一方面我也有对亲历的文革专制的恐惧，这种恐惧裹挟了我的私心和怯弱，让我不自觉地在一系列中国特色的谎言宣传下，尽量去理解并一度相信那些违背常识的说词。

30年过去了，无论是肯定毛的人还是否定毛的人，还有多少人会相信抓江青是“继承毛主席遗志”这种谎言呢？

现在我们很清楚，江青之与毛，和阿利卢耶娃之与斯大林是完全不同的。江青完全真心去努力理解并实践毛的思想，而阿利卢耶娃对斯大林则完全不能理解而处于绝望心态。斯大林夫人的自杀是由于无法解释的内心矛盾和痛苦，而江青最后自杀的时候仍然是怀着对毛的忠诚。你可以说她愚忠，却不可说她对毛不忠。

尽管我已经完全不认同华国锋抓起来的那些人，但并不表明我就因此要完全肯定华国锋的行为。凡是敌人反对的就要拥护这种小儿逻辑早被我抛弃。

李九莲、钟海源是广义的文革受难者

目前，有许多文献都把李九莲、钟海源看作文革受难者，还有专门祭奠文革受难者的网站也列入了她们的名字。我想，有一点必须说明，李九莲和钟海源的遇害，都是在文革后。因此，把她们作为文革受难者，必须解释这个时间上的矛盾。

在我看来，在广义上，她们仍然是文革受难者。我的解释是，在毛泽东的文革之后，还有一个华国锋的“文革”。

关于文革究竟结束于哪一年，海内外都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持结束于1968年下半年（或1969年4月）和1976年10月这两种说法的人最多。还有认可程度极少的一种说法，那就是华国锋发明的，结束于1977年7月（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创造了一个理论，就是他所领导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粉碎“四人帮”）是文革的伟大成果。华国锋的“发明”虽然没有获得政界和学界的普遍认可，但我认为其也不是没有一点价值。它提醒历史研究者，华所领导的这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许多方面与文革类似。至少，制造和接受个人迷信，镇压甚至屠杀对他的迷信怀疑的人，一点也不次于他的前任。而在藐视法治侵犯人权等方面，这次阶级斗争运动也丝毫不逊色于前十年。因此，我在上世纪90年代就称其为华国锋的“文革”，以区别于毛的文革。

在这种意义上，把李九莲、钟海源称为文革受难者，也还要再广义化。因为既然华国锋宣称文革已经在 1977 年 7 月结束，那在此后，1977 年 12 月和 1978 年 3 月才因为反对他而处死的李九莲、钟海源，就在华宣布文革结束之后了。

不过，据我的观察与思考，在江西，至少要待 1978 年底之后，华文革的势头才逐渐弱化，而 1981 年胡耀邦平反李九莲冤案，才使得华文革的引擎最后熄火了。

所以，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文革”这一范畴，就无法将李九莲、钟海源列入文革受难者的名单。

李九莲、钟海源是中华儿女的骄傲

每次我在课堂上讲到曾招银为了入党而上交“情书”，下面的学生总是“啊”声连片。仅仅过了 10 年 20 年，青年一代可能已经很难理解这种曾经很不少见的“告密”行为。但是，当我发现近年来在大学生中居然又有了曾招银之流的接班人（而且是由“组织”加以物色和豢养），我才又一次明白，“文革”真没有过去。

在我看来，将来历史会认定，虐杀李九莲、钟海源这样有良知的弱女子，是我们民族在 20 世纪的最大耻辱之一。

行刑的武警并不是真正的凶手。相反，那良知尚存的战士，多年后还将真相和盘托出，使后人得以窥知其中黑幕和血腥。人如果残存一点良知，像那个对钟海源行刑的武警战士，就会有愧疚而致觉悟。

曾招银是个小人，但还不是最大的恶棍。更大的恶棍是那些处心积虑置李九莲于死地，置为李鸣不平的上百人于死地的恶势力。戴煌的文章中点到的那些人，他们虐杀弱女，天良丧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却被无耻观念洗脑还自以为正义在手。

我当年也见识过听闻过许多与李九莲类似思想和话语，但是，没有人像李九莲那样有勇气、执著。最早我是从李九莲、钟海源身上体悟到，一旦认识到把握到真相、真理和真情，女人比男人更有勇气，更执著。

当年我也曾经想过，李九莲、钟海源如果能够低头弯腰，挨过几年，还是能够逐渐洗清自己的冤屈，挣脱自己身上的镣铐，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和新的思考。但她们身上有一种珍稀的精神情操，那就是，绝不苟且，不自由毋宁死。她们是江西儿女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2009 年 12 月 14 日初稿，2013 年 3 月修改定稿

【阅史漫笔】

人权缺失：李九莲悲剧的深层原因

张一哲

1997 年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

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并于 2001 年正式批准了后一个公约。2004 年修宪，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

在首届“北京人权论坛”上，官方理论家、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李君如在发言中也说过这样的话：“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大规模地侵犯人权的错误”，“也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

历史上代价最昂贵的情书

我最早知道李九莲是在 1974 年 4 月下旬。

记得那天，主管吉安地区工业的一位老领导，托我带话给我的一中校友、正担任某厂厂长的 L，嘱他不要对赣州的李九莲问题公开表态。这位地委领导对 L 有些器重，希望他能够多抓生产抓管理，不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什么闪失。

那天晚上我见到 L，就转告了领导的传话，让他“谨慎”一些。L 问我，你知不知道李九莲的事情，我说不知道。于是他大略告诉我，李九莲是赣州三中的造反派，和我们同一届。1969 年，她给她的男朋友，也是同学，此时已经参军的曾招银写了一封信，信里讲了对林彪的怀疑。想不到曾招银出卖了李九莲，把这封信交给了部队领导。结果，程世清把李九莲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坐牢。程世清倒台之后，她被释放出来，在偏远的的一个矿山当工人，并没有落实政策。李九莲现在正在要求翻案，而且赣州为此闹出很大动静。

他还告诉我，可能省里面涂烈之流是反对李九莲翻案的。曾招银现在是赣州地区工代会常委，也是涂烈一派的。

我是第一次听说了这位女侠的事迹，而且立即明白了这问题在当下的复杂性。

在情书中表明政治观点，是那个年代的中国特色；而表达这样危险的“异端”观点，则是李九莲的个性。这样的袒露，显示她的思想独立、坦诚、负责任的高尚品格，也显示了她的轻信和察人不深。正是这封情书，导致她两次牢狱之灾，最后死于非命；连带数十人坐牢，数千人受难，许多人终生难以翻身。并不认识她的钟海源仅仅因为为她鸣不平，居然极其悲惨地被虐杀。

一封情书招杀身之祸，连带成千上万人受难，这是不是人类历史上代价最昂贵的情书？

李九莲把那封信投进邮箱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这是一只轻轻振动翅膀将会掀起千里之外飓风的蝴蝶。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偶然性。但背后的必然性是什么呢？

以私人信件言论治罪是抹杀基本人权

李九莲的人权悲剧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了四场政治运动：1、文革中江西的“三查”运动；2、批林整风运动；3、批林批孔运动；4、华国锋的“文革”。

我们来看看，每个阶段，不同的政治势力，怎样打着不同的旗号（政策与口号），参与制造这场人权灾难。

第一阶段，李九莲给她在部队里当兵的男友写信袒露心扉，但私人信件中的言论，却成了剥夺她基本人权的依据。

此时，在江西全省正开展的“三查”运动，是江西省历史上一场空前的人权大灾难。在清查“历史反革命”和镇压“现行反革命”的浩大声威中，大批大批的干部和民众被揪斗、审查、拷打、关押，不少人甚至被血腥屠杀。这场人权灾难的主要责任人，就是当时主政江西、被一些人亲切地称呼为“程政委”而被我们称呼为“程魔王”的程世清。仅仅因为1949年前曾经为旧政权工作过或者仅仅因为父母在1949年前有过所谓“历史问题”，就可能成为历史反革命，甚至遭受极严厉镇压，而仅仅反对程世清就可以定为现行反革命。这场人权大灾难，正是李九莲人权悲剧的大背景。

起初，当时的赣州官方对李九莲的处理，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打算“教育释放”。但驻军赵副师长却认为“李九莲犯的罪都够杀头了”，将案卷捅到程世清那儿，这位林彪爱徒大怒：“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副主席的，在全国还是少有的”，批示“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

很显然，从当年中国政治势力的图谱来看，第一次把李九莲投入监狱的力量就是林彪势力，或者说是林彪在江西的代理人。

当然，李九莲属于小人物，她的案子到不了林彪那儿。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林彪本人与李九莲案件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无论从现代法治观念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来说，追究责任一定要到个人。因此，准确说，这个人权悲剧的责任人，就是程世清及其在赣州的喽啰们。

给李九莲治罪的法律依据是“公安六条”。这个法律规定：攻击林彪就是现行反革命。这实际上就是以言治罪以思想治罪。

李九莲怀疑和反对林彪，在江西是个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是，30年后在北京的著名的汪文风首长，却在他的书中奇怪地以为她曾为林彪喊过冤。可见，信息传播的可靠性，在封闭社会中多么不容易啊（参见文后所附相关信文）。

林彪倒了不给李九莲平反是漠视基本人权

第二个阶段，从1972年程世清垮台到1974年批林批孔之前。这个阶段对应的是批林整风运动。

林彪已经摔死在温都尔汗。事实证明，李九莲对他的怀疑不仅没有错，反而是早已洞穿其真相。李不仅不是反革命，反而是先知。这说明，即使按照当时的中国官方政治逻辑和政治标准，对李九莲的镇压，也是完全错了。因此，合乎理性逻辑的现象应该出现：李九莲被平反并受到嘉奖。

同时，将李九莲投入监狱的势力，此时遭到灭顶之灾。批林整风运动和同时进行的清查林彪死党的运动，使得统治江西的那个大魔王程世清下台完蛋了。从政治斗争的实力逻辑来看，似乎李九莲也应该凯旋出狱。

但是，这个结果没有出现。出现的是另外的结果：李九莲被定为“有罪”但“从宽处理”，是“反革命”但“不戴帽子”获得释放，并被弄到一个偏僻矿山

劳动，仍遭受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的歧视。

这个结果显示了一个政治秘密：林彪及其江西的代理人虽被定罪，但在赣州，致李九莲入狱的那个力量不仅还在，相关人员还在台上。那就是赣州的某些官员。其中为主导的那些人是文革中派性极强、抱着程世清粗腿爬上来的官僚，其次还有些没头脑、私心重、因循守旧的官吏。

稍微懂得一点中国政治的人就可以想到，如果李九莲与他们是一伙，李九莲立即就会被塑造成英雄；此前此后中国曾经有过许多这种英雄。而李九莲偏偏不是，这样，他们不得已把她放出来，却决不能给她平反。他们必须继续打压她。一方面，掩盖自己的罪错，证明自己一贯正确；另一方面，内心也害怕那个正义力量的审判。

他们的逻辑有两条：第一条，即使林彪现在完蛋了，你先前反林彪也是错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那个时候他是副统帅，你反他当然是反革命；第二条，当初抓你是对的，现在放你也是对的，如果你有什么捣乱下次抓你也是对的。总而言之，翻来覆去他们总是对的。

这样的逻辑所凸显的，就是一个基本人权观念完全缺失的社会逻辑和政治逻辑。

1974年4月下旬，我在吉安市的主要大街阳明路上看到了新贴的一批传单，可能是赣州市“李九莲调查委员会”印刷散发的。不久，我去南昌，在八一大道旁的墙上看到了围绕李九莲问题的大批大字报，内容既有为李翻案的，也有少数反对李翻案的。

有关李九莲的罪状，我记得，归纳起来，主要有两项内容。第一项，是李九莲对林彪的怀疑，内容颇多；第二项，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的。这条罪状只有一句话，说批判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于第一项，我与李九莲是完全共鸣的。李九莲比我先进，她在1969年已经直接怀疑林彪。我那时对林彪印象还好，但对林彪手下大将，除少数人（例如李作鹏）之外，都非常反感。比如说黄永胜和邱会作，当年获得的信息，他们一是道德败坏（那时可不像现在，乱搞女人是舆论影响非常坏的），二是残酷镇压学生运动。尤其是对林彪在江西的代理人程世清（这是当时的说法，现在看来代理人这种说法太文学了，也不准确），我持彻底批判态度。在1949年后江西主政者中，毫无疑问他是评价最低的。我们私底下一说起这个“程政委”，简直就是个专制魔王。

从程世清1968年春镇压南昌七中学生开始，我们就对他持批评立场。到后来，他大肆镇压洪都机械厂上万工人，尤其是他在全省搞的“三查”运动，把他的极左、残忍和专制暴露无遗。本来，对程世清的批判很容易导致怀疑他的后台，记得1968年5月，就在我们贴出反对程世清的大字报“五七意见”时，从北京到吉安柯云路就和我谈到，“你们的观点我完全赞成，但你们一定会失败的。因为程世清是代表林彪到江西来夺权的，林彪不出事情程世清就不会倒台。”尽管如此，当时我还真没敢往林彪身上想。

对第二项，我当时不赞成李九莲。我佩服也很赞成李的多数观点，只有为刘少奇鸣不平的话我是不赞成的。当时，我并不认为批刘少奇一切都对，尤其是群众性的对刘少奇的批判不无牵强附会和强词夺理。我懂中国政治的特色，打倒一个人就会否定他的一切。但我觉得，批刘是文革的最大事情，否定批刘就是否定文革。批刘是毛号召的，否定批刘就是否定毛。而我彼时正是肯定毛而反对否定文革的。现在看来，李九莲比我有更早更高的觉悟。

在南昌的时候我就感到，李九莲的经历和思想与我们类似，但她现实的举动与我们相异。她比我更大胆，更坚决。1968年以后，我接受了马克思的一个说法：“我的战场在书房里”，基本上退回到“书房”（当然是个文学词汇。我是在30年后才有了书房）里。今天看来，我也有我的道理，但我应该承认的是，当时，我的思想不如李九莲那么尖锐，行动也没有她那么有勇气。想到她是一个女性，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不过，根据我的政治经验和判断力，李九莲的案件将不容易翻。这并不是因为她没掌握真理，这时候我已经领悟到，在中国并不是什么人掌握真理就能够胜利的。掌握真理的人即使在认可真理的领导人之下也经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苦难，如果在抗拒真理的领导人掌权之下，这苦难就会更长了。我的直觉，这一次，李九莲可能还是下场可悲。

李九莲第一次入狱是因为一封私人信件，是她个人的行为导致。但第二次不同，她掀起了社会的行动，也是公开的政治。在中国，任何一种形式的结社和不在当局控制下的政治力量都绝不能允许。更何况，当这股政治力量在当政者（当时的涂烈之流）看来，具有显然的威胁。所以，采取群众政治的方式提出诉求，就必然惹来大祸。如果李九莲仅仅是写信向有关上级反映，那么她可能不会有那么惨的命运。我后来想，李九莲如果忍耐到1978年之后，她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她也可能会有机会更深入地思索。但是，李九莲就是李九莲，一方面，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给了她错误的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她以她的热血彰显了那股政治力量的专制和残忍以及这个民族与文化的悲剧和愚昧，同时也将人权的启蒙和问责永远留给了这个民族。

反政治迫害争基本人权致再入狱

李九莲当时喊出的口号是“反林彪无罪”，这是时代的语言。实际上，在今天看来，她只是反政治迫害争基本人权。

在第一第二阶段，情况和问题比较简单，而在第三阶段，问题稍有点复杂。

人们自然会问，1974年的时候，不仅林彪早已经摔死在温都尔汗，程世清也已经垮台2年了，此时正在毛中央号召继续深入批判林彪的群众运动中，为什么李九莲当初批林不是有功反而是有过呢？这问题在彼时的复杂性是什么呢？

原来，李九莲问题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案件，而是涉及1974年江西省两大派的斗争。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反人权的力量是程世清及其喽罗，第二阶段，反人权

的力量主要是赣州的程世清余孽，那么，在第三阶段，反人权的力量则是省、地程世清余孽的同盟。

这个程世清余孽的同盟，包括两股力量：

一股力量是省里的程世清余孽。其代表人物是江西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涂烈。

通过“三查”，江西造反派被全面镇压。正如历代王朝或历代政治斗争中屡见不鲜的叛卖和变节一样，曾经的南昌拖拉机厂的工人造反派头目涂烈，就是这样一个见风使舵的人物。当他抱住程世清的大腿，积极参与把江西省的造反派头头万里浪及其势力打下去以后，他取代万当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后来还当上省委常委，并且一时成为林彪“驸马”的候选人之一。

自然，随着林彪和程世清的倒台，他也受到某种压力或歧视。于是，他利用批林批孔运动之机，给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写了一封信，反映江西所谓否定和推翻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封信被王洪文批转，成为著名的中央1974年的7号文件的附件。涂烈捞到了一根政治稻草，成为一时风云人物。自1968年后，我就认为他是一个政治投机商，虽有这根稻草仍不改我对他人品的基本印象。

当时临时主持江西省工作的是陈昌奉。陈昌奉是省军区司令员，曾经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他署名出版的《跟随毛主席长征》的书，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读过，所以熟知此人。他本来也是省委省革委的领导人之一，但在程世清掌权时被边缘化，因此他在“三全会”（是根据中央7号文件召开的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党委三个全体委员会议的简称，因此类会议极其少见，在胡平的书中和其他许多正规材料中都误以为是省委或省革委第三次全委会议）上站出来时曾受到人们的欢迎。不幸得很，这位文化不高的老实人很快被涂烈所蒙蔽和利用。

九大时，鉴于毛中央的权威和意图，江西霸主程世清弄了两个群众的中委候选人，一个是安源煤矿的年轻工人潘世告，一个是年老的农民樊孝菊。当这两人分别当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时，普通江西人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程世清把全省造反派镇压下去之后，就把这么两个操在他手心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弄进中央委员会，连抱着他粗腿的涂烈也没有这种机会。当年我就看穿了程世清这种政治小计谋，这是一种并不少见的狡猾的农民式政治，程世清懂这一套。可不要小看没文化行伍出身的程世清的智商，他不仅不能允许有任何一点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人，也不能允许有一丝可能跳出他控制的人进入中委。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九大是造反派的会议”的说法，不知道创意者所说的“造反派”是否也包括这类镇压造反派的主谋挑选的“假冒伪劣”。

涂烈屁股上满是“屎”（不仅他跟着程世清干的坏事，他本人还被叶群的“找人小组”看上，成为“驸马”的候选人之一），他当然不愿意批林和清查林彪集团在江西的人和事。潘、樊两位中委，说实在话，可能是好人，但政治水平和经验太缺乏；再说，毕竟是程世清抬举了他们，清查程世清客观上对他们是不利的。所以，他们上涂烈的船，原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样，1974年上半年，在江西省级的政治斗争中，陈昌奉、潘世告、樊孝

菊和涂烈，形成了一个小“四人帮”。陈昌奉是名义主持工作的，真正摇羽毛扇的是涂烈。

1974年的江西还有另外一股大力量。批林批孔初期，在中央直接干预下，被程世清关押6年的万里浪出来了，并且恢复省革委副主任职务。以万里浪为代表的江西造反派是恨程世清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希望深入批林来清理程世清的遗毒，这与涂烈等人显然是有矛盾的。于是在南昌召开的省“三全会”上就逐渐演变成了两大派，即所谓“万派”和“涂派”。在1974年复杂的斗争中，“万派”的上层分子和原来省委的几个犯“走资派”错误的领导达成默契甚至结盟，形成非常少见和复杂的“造反派与走资派结盟”的状况。

1974年程世清在赣南本地的余孽，包括两部分人：一是以在地方革委会早已有名无实的少数前造反派头头为代表的赣州地方上的“涂派”；还有就是投靠程世清的一些保守派或仇恨造反派的干部，这两股力量在继承程世清政策镇压李九莲问题上结成临时的丑恶联盟。

这种复杂的情况下，省里小“四人帮”和赣州市的程世清余孽在观点和利益上就有了一致的基础。这是江西省1974年政治地图的大背景。

4月25日，陈昌奉对李九莲问题下达了第一次指示：“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4月30日，陈昌奉就江西运动发表全面讲话，再次斥责赣州有人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所谓“4·30”讲话，是江西省“三全会”的转折点，也是“万派”和“涂派”正式形成和分裂的标志。

从上述可以看出，李九莲案件也由此成为当时江西运动转折的一个重要因素。涂烈之流对李九莲的镇压，表明他们与赣州市的程世清余孽观点和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1974年4月，李九莲被重新关押，1975年5月被判刑15年。大批为她申冤的干部和民众，也逐渐被投入监狱或遭到镇压。

在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反而把最早批林的李九莲再次投入监牢。这只能说明，当年江西省的批林运动，或者彻底失败，或者纯粹是假的。

我当时判断，对李九莲的逮捕是显示对批判程世清的力量的镇压。不愿意批判程世清，除了涂烈之外，当然会有别的强大力量。但是我估计李九莲过两年就会放出来，毕竟她只是为自己（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冤案）的平反而进行的和平行动。我那时候无法料到，李九莲会有惨遭虐杀的下场。

以言论思想大规模治罪杀人是一场人权灾难

如果说，文革中李九莲第一次入狱是场人权悲剧，那么，文革后李九莲、钟海源被虐杀并株连千人绵延多年的大案，就是一场人权大灾难。

第四阶段的大背景是华国锋的“文革”。华文革与毛文革当然有很多不同之处，但在侵害人权方面则基本一致，有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至今未被充分认识。

程世清及其余孽把李九莲两次关进监狱，但并没有置她于死地。那么，置她

于死地的，把这场人权悲剧推到一场人权大灾难的，究竟是什么力量呢？

这时，程世清的余孽多数已退出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前三个阶段一直在活跃和成长的一股力量。此时，他们借助华国锋的“文革”而居于政治舞台的中心。

戴煌回忆 1980 年底的赣州调查时说：“我和江西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大吵特吵，他认为把李九莲杀了是正确的，而且问我屁股坐在什么板凳上。”在胡耀邦批示李九莲冤案平反昭雪之后 2 年，杜昭还把“李调会”的人员投入监狱。

我在江西时，没有听说过杜昭这个名字。倒是 1974 年第二次抓捕李九莲时任赣州地委书记的田启松，因为后来调任吉安地委书记，所以有点印象。田虽然难免有错，但给我印象似乎政策水平不低，派性也不强烈，不是杜昭类型的人物。

1974 年抓捕李九莲时的地区工交办主任杜昭，后来能升任地委副书记、书记，重要原因之一正是他在李九莲案件上的积极表现。

杜昭们完全以派性视角解读毛文革的结束，这样的干部也许不在少数。但是，杜昭的“不幸运”之处，是他的名字与李九莲冤案和那场人权大灾难紧紧连在一起。杜昭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会以这种方式被写入历史。表面上看来，把他以这种反人权的形象写进历史的是戴煌等人，其实是杜昭自己。

如果我们从世界人权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中国政治的狭隘角度来解读李九莲冤案，我们就能正确定位杜昭等人的历史角色。而且，我们也会看到，也许表现最差的还不是杜昭，而是那些在这场人权惨剧中直接实施暴行的人。

此时李九莲已经在牢狱中关押，她在一篇“自我鉴定”草稿中有这样的话：“华国锋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毛主席的一些教导和政策”，“妄图用暴力和血腥政策来强迫党员和人民的意志，”“暴露了他自己就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这些话，30 多年之后读来，仍觉得触目惊心。我们亲历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30 多年前，即使比这轻微得多的话，也会招来杀身之祸啊！我真的相信，李九莲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1977 年 12 月 14 日上午，在赣州市体育场召开三万人的公判大会。李九莲身穿囚衣，脚镣手铐，五花大绑，她的舌头和下颚被尖锐的竹签穿起来。他们貌似那么强大，为什么却那么害怕她的声音？不禁让人想起张志新被枪杀前被割破喉管……

游街示众之后，李九莲才被押到刑场。她死活不跪，行刑者一枪击中其腿，才把她打成跪下的姿势，最后倒在两棵小松树之间，死不瞑目……

她死后，尸暴荒野，家人不敢收尸，当局更是不管。人死之后尸身还遭受这样的蹂躏，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世界古代的专制社会都不常见。何况是在联合国《人权宣言》发布 30 年之后啊！

这一人权惨剧，给了一个“社会渣滓”一个“机会”：赣州老头何康贤“把李九莲的乳房和阴部割了下来，带回家‘享受’”。

记得是在看到李九莲被枪杀的布告之后不久，我遇到老同学 HQZ。他告诉我，李九莲被枪毙以后不准收尸，结果有流氓去把她的阴部和乳房割下来，腌在

锅里煮着吃。我马上联想到鲁迅先生的《药》，而且感到了两个事件之间的某种相似，李九莲悲剧更甚于秋瑾就义。

民怨沸腾了。老百姓实在忍无可忍，他们不敢把愤怒的矛头对着专政机关，但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发泄他们愤怒的机会了。难道这样一个流氓也有人敢保他吗？难道这样一个亵渎李九莲的变态罪犯也会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宽容吗？李九莲就算不是一个烈士，就算是一个“反革命”，她就可以遭到这样的惨无人道的对待吗？不要说人权，即使是中国传统文化，即使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能容忍这样的兽行吗？当局无法抵御老百姓的愤怒，况且这个老流氓也不是他们“圈中人士”，何康贤很快被抓，并被判刑七年。

这样的惨剧发生在文革结束之后一年多的1977年年底，一定令多数国人难以相信。

在李九莲被杀4个月后，1978年4月30日，钟海源也以“恶毒攻击华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名被枪杀。

当时我还不知道钟海源的名字。两年之后，我才听一位朋友讲述这位女侠的惨烈故事：

她是一个三岁孩子的母亲，一位小学老师。她甚至根本不认识李九莲，只是为她鸣不平而且死不改悔，就被投入监狱。在她被枪毙时，居然为了给一个干部子弟进行肾移植，为了保证活肾的质量，在她还没有死的时候，“医生”的尖刀插入活人的背部，把她的肾脏活生生挖出来，连麻药也不用。惨虐的场景甚至使行刑的武警都难以忍受。当江西去中央上访的群众讲述这一幕场景时，中直机关一位女干部甚至当场忍不住哭出声来。

说实话，即使我耳闻目睹了那么多人权悲剧，我当时还是难以相信这是真的。那时我已经听说过张志新所受到的残酷虐待，善良的人们不相信或者难以相信它是真的发生过。而钟海源的故事，更比张志新惨烈。我是一直到后来看到胡平记述的行刑武警的回忆，才最后确信，这样的反人类罪行确曾在我的故乡发生过。当医生都已经被毒化到缺乏最基本人性时，还有什么样的人权悲剧不可能发生呢？

1981年夏天，我才从老朋友LQF那儿听闻了那场人权灾难的规模。这些事实，若干年后从胡平和戴煌的书中得到证实：

据不完全统计，连同宣判李九莲死罪的公审大会上陪绑的十余人在内，前后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入狱的“李调会”成员达百人以上，其中被判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达六十人。

在监狱之外，许多声援过李九莲的干部群众，包括原地委常委、赣州市市长、原《赣南日报》总编辑、地区或赣州市的一些局长、赣州四周的一些县委负责干部多人在内，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开除公职或留用察看、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降职降薪或免职停职靠边站的，多达六百多人；

全市九个中学，就有两个中学的副校长被开除公职，三个中学的团委书记被撤职，两个中学的工宣队长被退回原单位……

挨批挨斗、写检讨、坐“学习班”的，以及受到株连的同学、亲友、熟人等等，则数以千计（其中有的人被迫自杀）……

那年秋天，我去北京的时候，逢人就说李九莲和钟海源的故事，其中不少人不约而同地和我谈起了鲁迅先生的《药》。李九莲、钟海源正是“夏瑜”、正是秋瑾那样的人物；而中国人的愚昧和无人性无人权观念的状况，使得几十年后的事件居然更加惨烈。《药》里面的老栓还只是用馒头去沾烈士的血，给他的孩子治病，那还只是愚昧，而在七十年代居然发生了容忍这种种兽行的事情。鲁迅先生在世，他将写出怎样的作品？呜呼！我的同胞！

言论自由真谛是保护少数人“不正确”的言论

言论自由是现代最基本的人权。

李九莲第一次坐牢是因为怀疑林彪——在私人信件中袒露思想。

35年前，我是这样认识的：既然林彪被毛主席和党中央认定为大坏蛋，那李九莲怀疑和反对他就没有错，相反，镇压李九莲的人，就是林彪势力及其余孽，当然就是错误的。

到1980年代，我才认识到，即使林彪没有毛中央所认定的反毛政变和叛国的罪行，即使林彪一直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因为李九莲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怀疑他而把李九莲关进监狱也是错误的。

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和更广阔的世界视野来说，李九莲第一次坐牢，仅仅是因为在私人信件中袒露思想。这就是最基本人权的被剥夺。这就是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通讯自由的被剥夺。这些天赋人权和宪法权利本来是不可剥夺的，但是手持暴力的反宪政反文明的力量，却轻易地剥夺了李九莲也剥夺了许多中国人的人权。这是李九莲案件的深层秘密。

常常有一种误解：认为言论自由不包括错误的言论，因此，错误言论是不受保护的。

这些人不愿意去思考一个简单问题：被统治者认可的“正确”的言论需要保护吗？如果以统治者认可的“正确言论”为标准来鉴别什么是错误言论，不就是简单由权力来鉴别正误吗？

保护少数人一时被认为“不正确”言论的自由，才是言论自由的真谛。我的同胞中的许多人至今不懂得人类文明的这个ABC。这是我所生活的时代一直缺少言论自由的深层原因。

有三股力量与反人权的力量斗争

在李九莲案件中，有三股力量在与反人权的力量作斗争。

第一股力量，是江西省尤其是赣州市的广大民众。

1974年，赣州“李调会”的口号中，就有一条“取消公安六条，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这是旗帜鲜明地争取现代人权的口号。

面对空前的镇压，为李九莲翻案的“李调会”却得到广大民众的巨大支持。李九莲案是文革中的一场巨大的人权悲剧，而为李九莲翻案则是文革中人民争取

基本人权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正如戴煌所说的，“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赣州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有的流落街头，有的离婚，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几年不给工作，负债累累……”

李九莲的冤屈有那么多人为之不平，显示了极其重要的民意。

钟海源甚至不认识她，就为她送命了。

老干部老党员方××，支持公开争辩李案，因此获刑 20 年。我后来听 LQF 说过，赣州市不少地市负责干部，都曾因为李九莲喊冤而坐牢。

尤其给人启示的，就是曾经在 1969 年抓捕或审判过李九莲的干部，后来反过来支持李九莲翻案，而遭遇迫害。其中，基层干部宋××，当年曾带队拘捕李九莲，后来觉悟过来，揭露事实真相，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并为此坐牢；当年曾参与审判李九莲的赣州市公安局干部梁×，9 年后也因支持李九莲翻案而被开除党籍。他们洗刷了自己历史上的瑕疵而以英名存世。

为李九莲平反出力最大的，无疑是“李调会”负责人朱毅；除此之外，为李九莲平反昭雪出大力的，还有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这位中国最知名的敢言记者深入江西赣州调查，不为既有意识形态和官权所囿，不为赣州地委少数帮派分子所威胁，不畏牵涉时任中央一把手的华国锋，写出为李九莲平反的内参，题目是《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未昭雪》，经当时的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社党组成员杜导正拍板发排。

第二股力量，是执政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健康力量的支持和坚持。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赢得了中国人对他永远的崇敬和怀念。

1981 年 1 月 25 日，戴煌写的《内参》稿一送上去，立刻受到了胡耀邦的重视，他当即给中央政法委书记彭冲、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长赵苍壁批示：“此事请予以妥善处理”，并提出“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彭冲当天就将耀邦批示传给江西省委领导人，让他们“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这才撬开了死死捂住李案的铁盖子。

1981 年 9 月 16 日，胡耀邦在中纪委的座谈会上谈到李九莲一案时，具体点出了受株连的范围：死两人、被判六十人、遭党政纪处分六百余人、株连逾千……胡耀邦强调说“出了这么大的事，现在还没有解决好，应该解决好”。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耀邦的亲自过问，李九莲冤案还不知道要拖到猴年马月。

第三股力量，是有一批良知未泯的领导干部。

最重要的历史例证，是有三名省委常委反对枪杀李九莲。

了不起，江西省委三常委投反对票

据戴煌的文章，江西省委在讨论李九莲死刑案件时，有三个常委投了反对票。今天的人们可能不以为意，我却认为这三个人相当了不起。

戴煌点出了其中两个人的名字：王泽民和张力雄。另一个名字没说，为什么？

我不知道。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本人不愿公开。考虑到江西复杂的官场关系和政治生态，当事人不愿出这个风头；还有种情况，是当事人后来可能出了点“问题”，或者由于其它原因，其名字不便公开。无论哪种情况，这位匿名人在李九莲案件上显示的，是良知与历史见识。

王泽民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向来政策水平较高，尤其重要的是，他完全没有卷入江西十年来严重的派性斗争。他曾说对李九莲的冤死“一直心存憾痛”，并且全力支持戴煌的“详细查访以期纠正这个大冤案”。

张力雄其时任江西省军区政委。他能投反对票，使我感到意外。尤其是他对戴煌去赣南调查李九莲案，给与了种种支持，更令人敬重。这也使得我对江西省军区干部的觉悟有了完全新的认识。

无论如何，这三人都很了不起。1977年那样的年代，他们能够以自己的行动避免自己一生中留下如此巨大污点，可见即使在狂风暴雨之时，良知与历史识见还是能够起作用的。

有件小事可以拿来对比一下。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江渭清，1975年曾经下令暂缓执行一个涉嫌强奸犯的死刑。那时候，吉安有一个强奸犯，被判死刑。就在死刑执行的当天早上，案犯的父母拦住了江渭清的坐驾喊冤。人命关天，江渭清一个紧急军线电话打来，刀下留人，暂缓执行。那时江渭清刚来江西，我对他印象远远好于其前任，无论当时或今天，我都觉得他没有啥错（至于说他党权干预司法，是完全不懂中国国情文不对题的指责，这里不论）。但这事情曾激起吉安公检法人众大不满。不久之后，这案犯经复查还是被执行枪决。江渭清能够在这样一个强奸犯的问题上谨慎处置，到了1977年处理李九莲这样一个纯粹的思想犯时，居然毫无谨慎可言。这个对比很能说明问题。

还可以比较一件大事。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由于第一书记江渭清的保护，江苏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县主要领导中没有抓一个右派，这与江苏的邻居浙江和安徽形成鲜明对比。在毛泽东直接表示不满并派彭真坐镇南京的情况下，江渭清仍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显示了江本人的圆通能力，同时也说明在1957年的政治高压下，省级领导人在具体执行中并非完全没有弹性空间。今天客观理性地说，在江西省历届主事者之中，江渭清属于政策水平较高的一位，而且他与李九莲案中的各种力量都没有太深渊源。他之所以无法避免他一生的一个大污点（《江渭清回忆录》中对1957年反右有“一直内疚在心”的话，但对杀李九莲一事只字未提），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头脑中的极左思想作怪（迟至1981年1月戴煌去江西调查时江渭清还坚持李九莲案不能翻），另一方面也可见当时江西省政治空间中抹杀人权的力量比1957年强大多了。

（本文原始信息参考了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第8章“为恶攻英明领袖华主席死难者昭雪”、胡平《中国的眸子》一书和朱毅《浴血并蒂莲：赣州李九莲年谱》等文章。）

附：

关于李九莲等案的叙事不准确

——给《从“童怀周”到审江青》的作者汪文风的信

汪老：

您好！

看了你的《从“童怀周”到审江青》（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年版）一书，其中有点小毛病，和您说一下。

第 53 页讲到江西李九莲案件，事实出入较大。

书中说，李是“由于反对江青之流在文革中的表现，被逮捕入狱。”“在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有的人出于派性，竟在提审李九莲时蓄意提到林彪，采用诱供办法。李九莲由于长期在押，不了解外面的情况，担心上当，就说了不许诬蔑林副主席等话。而有关部门竟以她在林彪集团垮台以后，还吹捧林彪，罪加一等为由，残酷的处决了李九莲和她的几个同伴。”

事实上，李九莲主要是因为怀疑和反对林彪，被林彪在江西的死党逮捕的。其罪名还包括“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涂脂抹粉”（李九莲判决书语，赣州地革委保卫部，1971）。她在林彪事件后出狱，但仍然结论为“现行反革命”，“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江西赣州地委文件，1972）。1974 年她要求平反，引发江西广大群众响应，被林彪余孽第二次逮捕。据我所知，李九莲从 1969 年开始怀疑林彪到 1977 年底被处死，始终没有在林彪问题上反复过。

李九莲被处死的罪名是攻击英明领袖华国锋。当时不仅“四人帮”已经被粉碎，而且抓她的江西林彪死党和余孽都早已先后垮台。而“恶攻”英明领袖罪，则是以当时的所谓“四个指向”（即指向华、党中央、大庆、大寨）一律是现行反革命的中央指示来定的。以此罪被隔离被抓被判者，在我当时所在的江西省无以计数。我原来是江西的高中生，与李九莲同是 66 届高三（不是同一城市），所以对李案了解。

此外，有关李冬民的部分（52 页）说“逮捕了当时已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李冬民”一语也不确，我 1974 年在北京曾见过李冬民，当时他就已复员。所以 1977 年只能说“逮捕了曾经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李冬民”。

正好李九莲和李冬民都是我的同时代人，而且我比较了解有关事实，所以写信和您说一下。当然，瑕不掩瑜。我也不多说客套话了。

您写道，“写什么东西，对事实，一定要力求尽量符合实际”（后记——顺便问一句，为什么后记中没有页码？这不给引用带来困难吗？），我相信您一定是这么想的和这么做的。因此，给您提供一点质疑供你参考。如果有再版的机会，希望做点修改。

祝您

健康长寿！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小金，

2004年6月14日

(此信通过当代中国出版社转交)。

附回音——

2004年6月22日,《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一书的责任编辑陈立旭先生给我来E-mail说:“汪老让我向您转达:来信已经收到。”